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英] 巴特菲尔德 著

李 晋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目 录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1
前言	3
一 导论	5
二 基本假设	11
三 历史进程	25
四 历史与价值判断	41
五 历史学家的艺术	55
六 历史上的道德判断	65
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79
出版说明	99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献给 保罗·维拉考特

For Paul Vellacott

前 言

本书研究的是我认为有公认含义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尽管本研究也可能对这个术语有所引申，但它至少包括对这几个字的一般理解。本书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这种对历史进程进行辉格党式的阐释与对历史的组织及推理的某些方法有联系——这些谬误在所有历史上都容易出现，除非它是历史研究。考察这些内容就提出了以下问题：有关历史研究与众所周知的通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一个历史过渡以及可称为历史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有关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局限性，尤其是辉格党式作家想从历史中获取历史不能提供的一种定论的企图。

这项研究不是作为历史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而是作为历史学家心理的一个方面来对待的。我用了诸如事态 [conjunc-

ture] 与偶发事件 [contingency] 来描述观察家与历史学家所看到的一切。本研究本身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性描述或哲学分析。而且，本书的主要论点将不会因为哲学家可能会做任何声明来解释或通过解释消除这些论点而受任何影响。

H. B.

1931 年 9 月

一 导 论

有人说过，历史学家是报复者，他作为法官站在历史党派、竞争对手以及过去时代起因之间，可以托起失败者、打倒自豪者；通过他的披露与裁决、讽刺与道德谴责，他可以惩治邪恶，替受伤者报复或奖励无辜者。无论把人类分为善与恶、进步与反动，还是黑与白，尽管人们对此分类不太乐意，但可以原谅。至于道德谴责没有使人分散精力而大大混淆人的判断力，这一点尚不清楚。历史学家有个人的、不公开的喜恶，而且作为普通人他仅仅喜欢加入他正描述的游戏，这些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受自己的偏见所左右，而且在情感上表现出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把这些表现得形象生动，看到这一切都令人愉快；他只有以这种方式踏入这个领域，才会认识到自己正进入一个由带有偏见的判断与纯属个人喜好的内容组成的世界，而且不会想象自己在充当权威 [*ex cathedra*] 讲话。但是，假如历史学家可以把自己上升为上帝及法官，或者以对历史上的罪恶进行合法报复者的身份自居，那么人们可以要求他应当比上帝还要公正，应当视他自己为

调解者，而不是报复者；认为他的使命是促进对人类、党派以及过去起因的理解，在此理解基础上，假如可以做到充分理解，一切都将最终得到调解。似乎有假定说，历史上我们有的不仅仅是几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观点，还有“历史的裁决”[‘verdicts of history’]，而且客观地讲，历史本身会告诉人类一些事情。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每个历史学家不仅交出个人想法以及他的一些离奇想法，而且所有历史学家都在尽力引出一种真实，可能通过综合他们各种有缺陷的想法来表达一种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完全获得的话，这将是**历史** [History] 本身的声音。但是，如果历史这样成了类似人类记忆的东西，代表人思考过去的精神的话，我们必须这样设想历史：它不是用来加深仇恨，或是认可党派的旧口号，而是要找出差异背后的共性，把所有生命看成那张生活网的组成部分。试图朝着这个方向探索的历史学家，可能正努力想使自己像上帝一样，但是与以报复者上帝自居的人相比，他也许不那么愚蠢。通过研究古代的纷争，他至少可以寻求对争斗双方的理解，而且他必须愿意比争斗双方自己更好地理解他们双方。在观望争斗双方落入时间与场景交织的网中时，他可以同情他们——而那些人可能都不会同情对方；尽管他永远也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假如他还没有希望把这些历史人物与他们的争论带入一个一切都得到理解和所有罪行都得到谅解的世界，那就实在令人费解。

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新教徒 [Protestant]、激进派 [progressive]、辉格党人 [whig] 以及标准的 19 世纪乡绅，这一点令人震惊。在成为一个决定论者之后过了很久，他仍坚持实施道德判断的神圣职责，像加尔文的门徒们一样，

他没有放弃道德谴责的任何权利。即使在他本人对自己年代的运动没有同情心时——譬如，哈勒姆 [Hallam] 坚决反对大改革草案 [Great Reform Bill]，而且一想到国家向大变革的方向发展就不寒而栗——但他骨子里的东西仍然使他靠近可以称为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对那些面临变化及革新时立场与他相似的人，他拒绝给予历史理解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可以说，我们对历史叙述的一般看法仍然打着撰写历史的老前辈们的印记，而许多老前辈们在没成为美国人之前似乎已是辉格党人与乡绅：撰写教材的历史学家们可能就是从这些人那里继承了高帽与自负，以及给“尽管是个反动分子，但在私生活上无可挑剔”那种人发鼓励奖时的优雅。但是，无论谈起路德 [Luther] 与教皇的争夺，还是腓力二世 [Philip II] 与伊丽莎白 [Elizabeth] 的争夺，或是胡格诺派教徒 [Huguenots] 与卡特琳·德梅迪西 [Catherine de' Medici] 的争夺，也无论我们对比查理一世 [Charles I] 与他的议会或是对比小皮特 [Pitt] 与查理·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历史学家似乎首先倾向于采取辉格党或新教徒的观点看问题，然后很快忙于把世界分为进步的朋友与敌人。的确，这种倾向在一些历史专家更精心的努力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正，但上述列举的所有例子以及很多其他例子当中，详细历史研究的结果居然一直在大力更正一种已经广为接受的新教徒或辉格党式的阐释。并且，这种辉格党倾向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便是在逐个进行的研究已经详细更正了历史时，我们在参照这些发现重新评价整个事件、重新组织主题的来龙去脉时仍然非常缓慢；罗米尔 [M. Romier] 先生对研究胡格诺派教徒的历史学家发出的悲叹，也许可以正确地归

由于历史其他领域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即使在具体研究已经改变了整个研究对象意义的情况下，仍然倾向于把新的研究成果拼到旧的历史叙述上。我们死死抱住最终上升为辉格党式历史阐释的某种历史知识结构不放，我们对研究的所有尊敬仅仅让我们承认，这项研究还有待详细的证实。然而，细节上的例外并没有阻止我们总是在同一个模式上筹划宏伟叙述；这些例外实际上就消失在构建与缩简的综合过程之中，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得出通史的总体概观；就这样，重大历史时期以来以及参照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辉格党观点最稳固、最持久；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专家与可以称作一般历史学家之间一种严重分歧所造成的后果。

事实上，所有历史都倾向于转为辉格党式的历史，假如我们只简单把它归因为传统阐释长期主导不变的话，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已经找到办法抵抗这种倾向，否则就会有块磁铁永远吸引着我们的大脑；可以说，假如我们仅仅诚实，假如我们做不到严格的自我批评，那我们会轻易被第一个基础谬误误导。尽管这也许甚至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适用于历史专家的详细研究，但只要研究对象一离开从事研究的学生之手，这种谬误就会起作用，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越是讨论，而不仅仅是调查，我们就越是在作出推论而不是研究，假如我们没有严格压制住我们最初错误的话，我们的历史就会更辉格党化；的确，所有历史在变得更加简短时，一定会相应地越来越辉格党化。另外，不能说偏见导致的所有错误都可以通过专门为反偏见撰写的著作而取得平衡；因为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把控诉词与辩护词相加就得到历

史的本来面目；尽管有过托利党式 [Tory] 历史——正如有过许多天主教 [Catholic] 党式历史一样——但研究对象本身的确仍然没有朝这个方向靠近的相应倾向；不能暗中使用同一种原始无意识谬误来预先判断正误。因此，相信主管历史的女神克利俄 [Clio] 站在辉格党一边就一直很容易。

二 基本假设

在理解过去的所有努力中，最根本的假设必须是，相信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理解不同于自己的思想。如果这一点不成立的话，那么人们之间似乎会永远相互隔离，所有时代就只能是一个无视惯例、一意孤行的世界了。假如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比如说——现代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思想，或是海德公园里一个无神论演讲者的思想，那么就很难明白我们怎能了解 16 世纪更为陌生的人，或者假装理解已将我们塑造成当今世界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历史学家假设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总是同一个世界，而且即便最为迥异的人也永远不会绝对不同。尽管阿奎那 [Aquinas] 所说过的一句话在现代人听来可能比较古怪，以至于有可能认为他是个傻子或者神经彻底不正常，但我认为，这样排斥他就是从思想上拒绝了解他，就是排斥人类本性及人类历史中重要的内容；实际上，这是拒绝作出努力去历史性地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正因为与我们不同，阿奎那才成为历史想象中更具魅力的研究对象；因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阐明过去与现在的差异，他的主要作用在于以这种方式充当我们时代与

其他时代的一个调停者。他的任务不是去强调和夸大两个时代之间的相同点，假如他想从过去寻找现在，那么他是在追随一系列错误观点。相反，他应该消除那些我们曾臆想存在的相似点。当他向我们证明大宪章 [Magna Carta] 是一个封建背景的一个封建文件、并且隐含意思与我们想当然认为的不同的时候，他就在使我们不再幻想过去的某种东西与现在极为相似。在许多领域里修正了过去被接受的辉格党式历史阐释的专门化研究的整个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参照事物的历史背景来讨论事物，然后发现它们与现今世界的不同，这已经使我们对一个接一个的历史时期都有了新的认识。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关键在于，结合现在研究过去；尽管当它的含义得到深思熟虑后可能不会引起反感，尽管可能有一种感觉认为它不可避免，但即便如此，这样做常常阻碍了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它把对历史的认识理解成直接地、永远地参照现在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现在的体系，历史人物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分为促使时代进步的人以及试图阻碍时代进步的人。这样，就产生了便捷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依照它可以任意挑选和淘汰，从而突出他的重点。依照这种体系，历史学家必定会把他的作用解释为，要求他对过去与现在的相似点而不是不同点非常警觉；这样，他会发现不废吹灰之力就可以说他已经从过去看到了现在，他会想象自己已经发现了 20 世纪的一个“根源” [‘root’] 或一种“预示” [‘anticipation’]，而事实上他处于一个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只是偶然碰到了一个可以说具有误导性的类似。在同样的体系下，辉格党历史学家会在一些特定事件之间找关系，比如把马丁·路德和一长串的辉格党人与现

代自由联系起来。假如他不留神的话，他开始忘记了这个联系只是他的一个思想把戏；他开始把它想象成代表类似一系列因果联系的某种东西。采用这种方法的整个结果就是，给整个历史叙述强加了一种特定形式，制造出一个注定永远漂亮地趋同于现在的一个通史规划——所有一切都在证实，各个时代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与辉格党始终是永久联盟，而天主教徒与托利党已经长久联合起来形成阻碍。这种结果的漫画式表现可以从一种至今仍未根除的流行观点中看到：这种观点认为中世纪 [the Middle Ages] 代表一个人类慑于权威而不敢讲话的黑暗时代——相比之下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就是一个反作用，而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是大反叛。这一点在街头谴责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人嘴里阐述得最完美；他说：“教皇统治英格兰的时期叫做黑暗时代。”

辉格党历史学家站在 20 世纪顶端，从他自己时代的视角来组织他对历史的规划；他从那个他可以用貌似合理的理论稳固自己的顶峰很微妙地颠覆一切。他可以说，在观察时间的流逝时，事件就会恢复它们应有的比例。他可以说，历史事件必须通过它们最终的问题来判断，但既然我们无法进一步找到这些事件的根源，就至少必须跟随到现在。他可以说，只有联系 20 世纪，过去发生的某个事件才对我们有所关系或重要意义。当讨论扯到日常生活、哲学被常识推翻时，他可以动用所有随手可及的理论；结果就很难证实辉格党历史学家如何从他的顶峰位置看到仅仅颠倒、扭曲后的历史过程。谬误就在于，假如研究 16 世纪的历史学家总是想到 20 世纪的话，他就跨越了路德或教皇与我们自己时代之间的所有时

期而直接进行参照。尽管这种把过去与现在直接联系起来的方式让一切变得容易并作出一些极端危险的明确推断，但这必将过于简化事件之间的关系，导致一种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完全误解。

这种历史态度绝不是历史专家在开始研究自己特定课题时所采取的；当我们更加接近过去时，我们确实发现，即使我们可能口头上已经接受了这些原则，但在实际行动中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原则。尽管我们作出努力，尽管我们采用了一些理论，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初衷是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我们无法避免自己不去直接闯入过去，而且为了过去而沉溺于过去；很快，我们可能会关注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如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的耳环或者拥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复辟王政的人 [Jacobites] 的冒险活动。但是，我们在设想或评论历史总过程时倾向于采取这种态度，当专家自己把他的研究项目与更广泛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时也经常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这种倾向。也就是说，它代表着我们纵观历史时容易陷进的一个谬误以及一种未加审查的思维方式。这就象介入历史专家及普通历史学家所从事的部分组织性、部分缩减性的工作之间；就在我们从研究特定时期的微观视角转到研究总体的纵观视角的焦点变化时，这种思维方式自动介入；随之而来的是那种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与从事研究的学生所讲述的历史完全不同。

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也可以基于另外一种假设；他在从事一项研究时似乎确实根据这个假设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去作出反应并指导其思想。他根据这个观点作出努力的同时明白这个事实，即他正在尽力为了过去而理解过去，尽管他的确

永远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对目的的这种意识与辉格党历史学家的迥然不同，后者认为他正在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要达到真正理解历史，不能靠把过去从属于现在，而必须把过去当作我们所处的现在来对待，试图用另一个世纪而不是我们世纪的眼光去看待生活。要达到真正理解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自己的时代是绝对的，而路德和加尔文及其时代只是唯一相对物；只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即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同样真实有效，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同样重要，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同样充实、同样重要，才能真正理解历史。20 世纪有许多鸡毛蒜皮的事情需要争辩，因此对给世界添乱的阿里乌 [Arius] 与亚大纳西 [Athanasius] 在复合元音上的争执可能很少有耐心，但历史学家只有认识到复合元音对那些人来说必定是宇宙上最重要的问题，才能最终达到那种令人放心的理解。只有这样把重点放在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努力了解上面，才能看清楚他在阐释过去与现在的差异上投入了多少精力。过去有些事情起初看上去似乎古怪、也许在当今看来甚至邪恶，但他没有因此而表示愤慨，也没有对此置之不理，相反，他努力将这件事情放进一个自然的背景中，通过证明它与我们真正理解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来阐释清楚。而把注意力放在现在的人会倾向于问诸如此类的问题：宗教自由是如何产生的？而辉格党历史学家经过巧妙调动其感情，可能会这样问：我们应该感激谁给了我们宗教自由？当下研究 16 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更有可能问，那些日子里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迫害？从这种特定意义来说，这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是有关过去而不是有关现在；并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

程中，历史学家站在了自己的阵地上，正在作出自己最适合作的那种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总是仅仅因为他正在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一事实而原谅罪恶。那些我们最陌生的事情成了他阐释的对象。只要他解释不清为什么 16 世纪的人进行宗教迫害，人们就可以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进一步讨论宗教自由如何发展到 20 世纪这一问题。

但是在作出理解过去的这种尝试之后，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发生在过去的变化，找出产生过渡的方式以及考察这个世界上事物发展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所有历史学家聚在一起，观看他们合作的全部成果，我们会发现他们正在研究已促使过去变为现在的整个突变过程。从集中研究任一变化或过渡时期的任一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就出现了一种历史真实，它似乎与一种哲学真实相结合。考虑到过去运动的复杂性、所牵连的问题以及那些造就复杂当今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一切不亚于全部过去；这本身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历史研究的结论，是历史学家能抓住的唯一可靠的因果联系，也只有在这方面他可以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把握的论断。当有必要从现在中整理、搜索出一个必须追溯历史才能发现的事实或特征时，历史学家面临的绝非只是通过一个人的揭示所能完成的，他发现相互作用之网如此错综复杂，不可能指定 16 世纪的任一事件就是 20 世纪任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学家最多能做的是，有可能找到从一代到另一代事件发生的顺序，而不是努力绘出永远与第三代及第四代相互交织而变得无比复杂的因果关系图表。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全部场景的一部分，它在一个特定时刻制约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要理解这种行动，就要找回与它

有联系的上千个线索，将它置于一个联系的体系中。换句话说，就是把它置入它的历史背景中。但是，要找出它产生的结果不太容易，因为这些结果与当时共同作用引发变化的其他事物的结果融合在一起。假如路德运动与当时王孙贵族的政治抱负不合拍的话，我们无法得知路德会在什么地方。假如路德没有来帮助王孙贵族们的话，我们无法得知那些王孙贵族们会怎样。

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既是以下事实的必然结果，又证实了以下事实：我们越是研究事件发生的方式，就越不得不从简单走向复杂。只有进行一种实质性的研究，通过显微镜看历史的某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看到隐藏在任一历史变化后面的各种复杂运动。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发现时间与人类目的所开的玩笑，因为时间常常把那些目的变成未实现的目标；或者说，我们才能认识世界经历一次过渡时的种种复杂过程，这种过渡在我们回顾往事时似乎是进程中自然、容易的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看到人们走出迷津或者接受新事物之前环境必须提供的那些古怪调停。也许最伟大的历史一课就是，展示人类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任何特定行为或任何人为决定所带来最终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表面上看，这一课只有详细研究才能学会。这一课注定要在节选中丧失，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节选有时故意要宣传与历史真相相反的东西。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过去如何转变为现在，但有一点是真真切切的：他能给的唯一解释就是道出故事的原委，通过详细讲述来揭示其复杂性。事实上，造成现在的突变过程与那些首尾相接、交织到一起并被看作一个整体的最冗长、最复杂的历史研究工作一样冗长，一样复杂。

辉格党历史学家的谬误在于，他抄近道越过了这种复杂性。一般历史学家的困难在于，他不得不节选，而且必须在不能曲解历史特殊启示及意义的前提下节选历史。任何对过去的概述都存在这样的危险，就怕我们循环争论，把历史从未授予以及历史研究从未发现的教训归咎于历史——这些教训实际是一些我们根据特定的组织知识的方式所作出的推测。我们可能相信进化论的某个信条或是有关进步的某个主张，也可能用此来阐释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但历史的贡献不在于进化，而是帮助我们认识到进步的历程如何崎岖不平，有悖常理，历史道路多么不遂人愿，其曲曲折折多么固执任性、耗费人力，而且从来不直接达到目标，还常常迷失方向，会因为任何事态而转向，然后从后门回到我们面前——假如它真的返回的话。我们可以相信有某种神灵指引人类命运，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写进历史；但是历史本身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要验证神灵是否正确，而是要我们认识到神灵导引的方式有多么神秘以及它的多变性有多么奇怪——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神灵可以使用任一手段来达到其目的，并且通常自相矛盾、反复无常，让人不解。假如我们意识到它们只是假设的话，我们的这些假设倒无伤大雅，但世界上最谬误的就是，基于一个假设来构建我们的历史知识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根据那种构建来作出推理，并宣称这些是历史之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容易陷入前面我戏称的辉格党式谬误。

辉格党式的分析方法与节选历史的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假如要将所有事实都完整讲述出来，辉格党式的方法以及以这种方式讲述的历史都无法做到。辉格党式的阐释理论——

即我们是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背后所隐藏的理论，实际就是为更好地服务于节选历史所设的。这样做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方便的准则，通过这个准则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过去有哪些重要事件，原因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我们的视角”认为重要的东西。这个理论如此之贴切，以至于没人会把它误认为一群最不可能低估历史一个方面的一派作家提出的；确实，假如不是为了通过提供一个淘汰其他内容的借口而简化历史研究的话，采取这种理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个理论是重要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穿过历史复杂性的途径，它确实提供了一条捷径，让我们穿过造成时代更替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迷宫；它帮助我们回避历史研究的真正问题。假如我们以与现在无直接联系为借口而排除某些问题，我们已经把复杂历史中最棘手的难题去除了，也把弯曲的扳直了。毫无疑问，采用这个原则必将在历史上导致一种有利于辉格党的偏见，必将对天主教及托利党派不利。换句话说，辉格党式的历史并非真正的节选，因为它实际上以一个含蓄的筛选原则为基础。采用这个原则及方法，就让我们忠实于整个历史叙述的某种组织方式。在历史学家考察 16 世纪过程中立志发现对那个时代本身很重要、或在那个时代比较有影响力的事件时，情况会截然不同。假如我们能想象一下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全部著作节选总结出的对几个世纪的纵观，假如我们将这个纵观与根据辉格党原则，即“从现在的角度出发”——编制出的对整个时期的纵观相比，我们不仅会发现辉格党版本中的所有复杂内容大大简化，而且会发现历史叙述得到重新铸造，而且最重要的评价也得到修正；换句话说，我们会发现一种讲述完全不同内容的节

选后的历史。根据我们始终贯彻的直接参照现在的原则，我们被迫得出叫做辉格党式阐释的历史版本。

看到16世纪新教与天主教争斗，我们记起了20世纪我们对自由的认识，眼前就会是天主教与新教在现在的相对地位。我们就会看到一整套隐藏的推理，这些推理建立在把16世纪与今天在思想里联系起来的基础上；即使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我们历史叙述的大致轮廓将会初步形成；新教徒会被视为一直在为未来而战，而天主教徒将明显是为过去而战。基于这种最初的偏见，我们可以遵循一种必将坚定我们信念、束缚我们思维的技术性步骤；因为在更加仔细研究马丁·路德时，会有一块磁铁能让我们从历史中取出我们要寻找的东西，通过借用一百个引言来证明路德的理念与今日世界之间有种可比性，发现路德身上预示着现在；这些引言都脱离原背景、与一种特定历史事态相剥离。历史是一门微妙的学问，它可以把我们困在能想到的最冗长的循环论争之中。我们如何开始进行艰辛的研究，这非常关键——譬如，无论是否把16世纪的新教徒看作促进我们现代世界发展的人、把天主教徒看作力争保持中世纪存在的人，还是我们是否把整个现在看成是整个过去的孩子，把现代世界看成是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现在作为永久的试金石，我们很容易会把16世纪的人分为激进派与反动派。但是，我们可能不会问许多问题，而且假如我们采用16世纪看待自身时代的观点，或者假如在审视我们自己时代的运动时客观地看待事件进程，那么我们会更好地发现过去是如何转变成现在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倾向于看到激进派与反动派争斗得那么激烈，而只是把它们看作在时代下一步发展

问题上观点不同的两个派系。我们不能把现代世界的诞生看成是任一时代的光明之子战胜黑暗之子的结果，把它看成是意愿撞击的结果至少会好一些，这个结果常常任何一方都不想要，甚至也不是梦想中的；有些时候可能双方都同样痛恨这种结果，但这是双方存在与碰撞的必然结果。

辉格党历史学家面前的道路比较好走，他以较快的速度得出份量重、专业性强的历史判断；因为他拥有一个可以化繁为简的排除原则，使他把复杂事物中最棘手的成分排除出去。通过利用观点与我们自己更为相似的那些历史人物及党派，把这一切同历史的其它内容作对比，他就找到了现成的历史结构及历史节选，找到了穿越复杂的平坦大道。他的这种历史结构将更清晰地回答历史到目前仍不能回答的所有问题。即使在他还没有深入研究任何问题之前，他就能得出针对历史问题似乎显而易见的判断来。这种结构会使他毫不含糊、早早作出决定，在历史研究还没说什么之前以及面对一切它可能说，不论福克斯有什么罪过，他都在从皮特那里拯救自由，而无论皮特有多少优点，都不能认为他从福克斯手里争取自由。不过，本文的主旨在于，当我们参照现在构建通史时，我们实际是在制造一种巨大的视觉幻觉；主旨还在于，经常让历史以最确定的口气发言的许多问题不是根据过去作出的推测，而是根据从过去精挑细选出的一系列特定内容作出的推测——这些精挑细选内容的起源本身，就让人想问一些历史学家正伪装回答的问题。本文的意图是，新教与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比新教或党派实际偏见更微妙；当那些直到不能再反对下去的时候才停止反对妇女投票权的人从大改革草案的反对者身上只看到滥用权益从中牟利的腐败辩护

者时，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正是这种对理解历史所作努力的局限性需要得到解释。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不仅仅是辉格党人的财产，它要比思想上的偏见更为微妙；它的微妙表现在一种结构上的把戏，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有可能陷入的不假思索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被称为历史学家“可悲的谬误”[‘pathetic fallacy’]。这是从事件的历史背景中抽取出一部分内容，然后脱离它们的背景进行判断——用直接参照现在的体系评价、构建历史叙述的结果。

可以说，很少有历史学家长期一贯地去采用讨论中的这种辉格党原则。还可以进一步说，这种原则也不可能完完全全被采用。它的逻辑结论，如果有的话，将是不参照过去研究现在；假如我们能通过谬误的一些最好例证来判断的话，逻辑结论将是一个的确接近了的完美——譬如针对欧洲中世纪早期 [Dark Ages] 的一些流行看法。这种辉格党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在理解过去方面出现许多屡见不鲜的错误认识，但是其应用绝不仅仅局限于经常出错的领域：见证一下这个原则能被历史学家推举为一种确定理论这一事实吧。它代表的是一种我们很难不陷入的误区；但除此之外，它恰恰是所有历史推断错误的总和与解释。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一只眼盯着现在而研究过去，是历史上所有罪恶与谬见的根源，从最简单的开始说，就是时代错误。这就是我们正作出似乎最明显评论的时候陷进去的谬误。这正是我们说的“不符合历史事实”[unhistorical] 的含义。它描述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看待中世纪的大致态度。它描述的是 18 世纪对过去许多时期的态度。它说明了参照原始德意志式的 [Germanic] 自由理论用来阐述英国历史的那种特殊形式的辉格党式的阐释

为什么如此貌似可信。它解释了已得到专家们研究修订的一百种辉格党及新教版本的历史。尽管大概可以说一切错误随时都可通过更为详细的研究得到更正，但必须记住：这个论点本身就有拒绝置疑的性质；它与我们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的观点相左，它本身就支持限制我们的目标与研究这一观点；这种理论认为，只要我们适度把握，历史会非常有用；并且，一旦有什么与历史研究不符的地方，它会转为一种道歉。如前所述，只有放弃这种论点，我们才能相应地开展一种更细致的研究。即便如此，甚至是作为最后一招，虽然进一步的探究已经纠正了这种谬误所导致的许多大错，仍有一种感觉，即假如我们坚持辉格党论点，历史研究将永远不会进步，因为它永远无法介入我们争论的圈子里。专家本人会受到欺骗，假如我们从所谓现在的角度重新改动他的著作——仍旧挑选符合我们原则的内容，仍旧把新的研究贴在旧的历史叙述上，他会徒然地向我们大叫。

三 历史进程

辉格党式的研究方法必定会导致将历史叙述过分戏剧化，它往往会让历史学家误读任一时代中任一争论的双方。与现在更类似的那一方被认为具备连仔细研究也无法证明的更多相似性、更多现代性，原因仅仅是历史学家重视相似性，并且正在把它们从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正让它们成为他的主要论点，因此结果是，许多人认为 16 世纪的新教徒或者 19 世纪的辉格党人看上去要比他们事实上更加现代，尽管我们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已经纠正了这种印象，但仍然很难将他们的世界与我们世界之间的不同铭记在心。尽管上天可能证明，促使路德极度气愤的绝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宗教狂热，但最坏的是，一些人似乎情愿相信路德是个现代派的新教徒，与罗马的宗教狂热斗争而争取更广泛、更自由的神学。碰到那种通过说“无论如何，路德的思想本质属于中世纪”来解释上述一切的历史学家，事情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因为这种研究中出现的带解释型话语，正是辉格党历史学家的罪恶与错觉，这种事后的想法仅仅说明，他没有结合背景真正去考虑事情，而是在讲述一个现代化了的历史叙述。但是，假

如由于这种历史研究方法而误读一方，对立方的遭遇似乎更加悲惨。这种方法对创造现在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造成了一种阻碍；不能通过直接参照来证明它曾经是根源或预示着现在；最坏的是，它变成了一种样品以更好地衬托辉格党的重大优点；因此，恰恰是本可以帮助纠正原始谬论的为理解历史作出的努力，常常得到否定。所有这些当中，我们往往由于自己的脱离具体的过程以及组织方法而使历史研究正在具体实现的所有工作都白干了。我们在忽视历史研究的首要条件，即承认其他时代与我们时代有多少不同之处。

假如 16 世纪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可以返回来看 20 世纪的话，他们会同样哀叹这个古怪疯狂的现代世界。尽管他们互相争斗得非常猛烈，但毫无疑问，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假如是因为路德一手造成了这种自由、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路德会承认自己的错、自己的邪恶，而他的敌人会很快地说，宗教的衰落一定是他那种分裂活动造成的。16 世纪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这样做肯定没有历史根据；假如我们通过草率的对比，认为其中一方为得到类似我们现代世界的东西而奋斗，另一方则企图阻止目标的实现，我们则是在忘却一点：二者的历史均可以追溯到 1517 年，历史都比较悠久。我们最世俗的历史学家以及那些对“世俗过程”[‘process of secularisation’]（其中许多内容可以追溯到宗教大改革的“捣毁中世纪主义”[‘break-up of mediævalism’]）最为感激的那些人，在写作中有时倾向于认为，仿佛新教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帮助执行这个进程而存在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路德反叛罗马教堂与社会的世俗化有多大程度，宗教大改革

与宗教复兴心理上有多少重合之处，以及路德对教皇职位的反叛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促成了反宗教改革的狂热，而我们喜欢看到新教的优点在反宗教改革当中熠熠发光。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新教与后来出现的天主教本身，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上出现的世俗化以及中世纪理想解体影响——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但要记住这点并不容易。

假如我们摒弃与现在的所有对比，勇敢面对辉格党的愤怒攻击以及它熟练掌握的一切谬论，把16世纪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看成是遥远而陌生的人群——实事求是地——把他们的争论看成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就象古老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中蓝党 [Blues] 与绿党 [Greens] 之间的纷争一样，这样就可以更加忠实地总结出真理。也就是说，最好一开始就假定二者不同，然后再让逐渐显出的相同点在合适的背景中表现出合适的比例。正如理解一个美国人一样：先假定他像英国人，然后由于他与英国人特征不符合而与他争论，这是错误的。更好的办法是，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外国人，然后再从不同角度看这个人与我们有哪些相同点。采取这样的观点，我们就会看到16世纪中宗教的两种形式的碰撞，而这两种形式在那个年代不可能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互不相容。并且，从这个碰撞我们会通过想象不到的更为复杂的途径——这些途径实在过于复杂、无法找寻——看到一些宗教自由的出现，可能会看到一些宗教冷漠，还会看到历史学家喜欢称为世俗化过程的整个趋势。我们将会看到，16世纪的新教与天主教彼此更加相近，与我们经常愿意想象的相差甚远——因为它们各自声称自己的宗教是唯一货真价实的宗教，认为教堂及社会应该无一例外用它来奠定基础。我们将

会看到，正是由于它们在完全排外的主张上如此相近，所以给世界提出了从未碰到过的最富想象力的一个问题。他们展示给世界一个事实：尽管所有的人都宁愿视而不见，但最终证明无法回避——一个社会中两种宗教形式是并存的；他们为世界提出了一个面对史无前例的反常如何让生活成为可能、可以忍受的问题。既不是新教，也不是天主教，而正是存在着两个派系这一事实是历史进步的起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辉格党研究方法的第二个谬误：由于将历史过度戏剧化，它往往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历史进程转移开来。辉格党历史学家过于简单地把历史变化及成就说成是某个派系或某个人带来的，把问题解读为一个已经达到的目的，其实通常情况下这只是一个被玷污的目的。他把历史进程过于简单化。辉格党历史学家喜欢证明加尔文主义对现代自由的发展作了多少贡献。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加尔文主义在日内瓦 [Geneva] 及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建立了它的新耶路撒冷 [New Jerusalem]，姑且说，独占鳌头，可以随心所欲对待人们，结果却与辉格党论点所假设的根本不完全统一。无论我们的主题是加尔文主义还是别的，常常容易说出与辉格党历史学家不假思索信以为真的内容恰恰相反的意见。假如我们转而感激在某些国家里甚至促使加尔文主义（可能也不是加尔文主义的意愿）变为自由之同盟的那些事态及相应的场景，而不是感谢加尔文主义给予我们自由，这样做也照样合情合理。不论怎样，让我们感谢 17 世纪的英格兰清教徒，但也让我们感谢他们那么长时间一直处于弱势、对抗着政府；因为这正是它们有用的先提条件。

由于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认识，辉格党历史学家注定要陷入一个常见的误区。他会倾向于把英国宪法想象为辉格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是越过很多暴君与托利党障碍的结果。其实，这是两者长期相互作用、永久相互碰撞的结果。它恰恰象征着这种互相作用所必要的所有平衡、调和及调整。辉格党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尽管有很多坎坷，英国宪法最后终于平安无恙地诞生了；而实际上这却是他似乎抱怨的那些坎坷所带来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宪法从未遭遇过危险，那么宪法就永远不会在危险时刻诞生。用最具体的话来说，我们的宪法不仅仅是个人及党派努力的结果；它是历史的产物。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辉格党历史学家有时似乎相信，历史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逻辑，这个逻辑站在辉格党人的一边，并且让辉格党人看上去似乎是进步的合作者。但有一种具体的感觉，即可以说他根本不相信有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他没有看到正是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对立而使它们相结合，产生了那些造成时代更换的相互作用。打个比方说，他没有看到时间参与了这场游戏，历史进程本身正在影响事件发生的模式。他没看到历史实际上深深包含在英国宪法中，同样也包含在现代世界中。他指出了假如路德没提出宗教改革标准所有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意识到，在颠倒这一切并将所有一切都归功于路德的努力和成就之时，就会陷入基本谬误。事实上，这些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复杂历史所导致的。

他根本上的错误概念所导致的最明显后果莫过于辉格党历史学家追溯本源这一方面；因为假如我们把这种追溯变为找寻类比性，或者假如我们企图过于直接地从过去寻找现在，

我们会陷入极大困惑。假如我们问，应该感谢谁给予了我们宗教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可以问，这种自由怎样出现的，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要翻遍历史去找答案。假如因为我们仅仅发现了第一个讨论自由根源的人，就认为已经发现了自由的根源，那我们就错了。假如我们在所谓的“各种观念的历史”[‘the history of ideas’]这一过于简化的范围内研究问题，或者假如我们把观念本身人格化，认为它们是历史上独立的机体，那我们就错了。假如我们认为，在说到宗教自由“可以追溯到”[‘can be traced back to’]某个人时就意义深远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术语的牺牲品。假如我们断定“要不是路德”[‘but for Luther’]，这种自由就永远不会像它实际上那样降临，并认为由于路德的光荣及成就才造成自由的诞生，那么我们要的是辉格党历史学家已经惯用的教材术语中的一个把戏。要作出以下断言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路德没有挑战教皇，历史上以及当今世界有许多事情就永远不会像现在一样发生；同样，假如哥伦布[Columbus]没有发现美洲的话，有许多事情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发生；但是，把路德作为有功之臣的远祖，与把哥伦布作为现代美洲的鼻祖，同样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人为四百多年前由其他有影响力环境组成的整个网络添加了一种有影响力的环境。事实上，我们无法确定哪种宗教自由归功于路德，正如我们无法计算出1930年生产的男士西装价格当中有多少应该归于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人，蒸汽机的发明者，以及实际纺织布料的厂家一样。仅仅因为路德曾经在内涵多种多样的世界里提出一些自由原则（而其实当他看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后果时他退缩了），就沿着可以追溯到路德的线索探究

自由的根源，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是通过一条线索，而是通过一个迷宫似的网络，才有可能绘出宗教发展到今天的进程图来：因为这种自由来自曲折的道路，并且产生的条件比较费解，它代表着被玷污的目的，而不是已经实现的目的，它归功于我们无法得知的与宗教或自由几乎不相关的许多机构。我们无从得知该感激谁给予了宗教自由，我们除了感激造成全部现今的全部过去之外，感激任何个人或事件都不合逻辑；除非，我们选择感激上苍，让如此纷繁的事态为我们提供最终利益。

假如我们从每个时代看到未来与过去的冲突，看到可以称为进步党与反动党的争斗，我们会发现自己根据一个实际上逐渐显明的进步原则构建历史叙述，我们的眼睛会盯在似乎专门促发了那种进步的某些人身上。我们会受到诱惑，问一个致命问题：我们拥有的宗教自由应该归功于谁？然而，假如我们从每个时代看到意愿的一种冲突，从这种冲突中出现某种可能从没有人愿意看到的東西，我们大脑就会集中考虑产生这种不可预测问题的过程，我们会更加欢迎对构成历史变化基础的动因及相互作用进行详细研究。在这些情况下，就能恰当地提问：宗教自由是如何产生的？历史转折的过程就不会被认同为辉格党历史学家所假设的那样——更不象逻辑辩论的程序那样，倒更像可以把人想象成从“复合体”[complex]解脱出来的那种方式。这种过程通过调停得到推动，而那些调停可以由世界上任何东西提供——或是人们的罪恶或误解、抑或是我们只能称之为幸运事态的东西。从事情的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用的是非常古怪的纽带；我们在纵观通史的时候可能看不到它们，但是它们的发现却是

历史研究的辉煌。历史研究的不是起源；而是对过去转为现在所经过的所有调停的分析。

正是因为路德完全想当然地认为世俗王子会成为上帝般的王子，正是因为他完全认同中世纪社会的假想，他才认为旧约 [Old Testament] 君主的一些权利属于统治者，才给他们强加了改革教会的义务。他完全确信统治者会成为宗教的仆人，却忘记了教皇在处理世俗权力时坚持要的那些保障条款的必要性；在那个特定时刻路德通过要求统治者帮助他，他做了某种帮助国王及王子成为一切的掌管者，甚至成了教会的主人的事情。假如中世纪限制了世俗王子对精神领域的控制，路德本身实质上最认同那种限制。然而，不知不觉，并且也没有解放自己的思想，路德帮助简化中世纪的争论并化解了他那辈人绞尽脑汁要解决的复杂问题，要查清楚他帮了多少或没帮多少，对历史学家来说太复杂了。但是，也许他甚至连这些都没有做到，也许在其他任何时期他的行动都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其他时代的国王虽已介入教会改革却没有取得对教会的统治权。也许当时仍然有更深层的运动将一切都变得对世俗王子与世俗政府有利，这一点及其他一切被当作实现其目的的桥梁。不论怎样，通过这种复杂的调停，中世纪的宗教社会最终转变为现代时期的世俗社会；这种世俗化过程的过渡只能通过调停，通过微妙地去各种复杂性以及限制，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人们头脑中它意味着，这些深刻变化不可能通过符合逻辑的论证来实现；它意味着世界上整个系列运动不可能通过强硬的意志来实现。它意味着，新观点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诞生：通过平静地解决偏见、通过新条件的影响力产生新信念、通过每个时代

传承传统过程中各式各样的遗忘以及通过许多可以让人们不知不觉产生新观念的删节过程。它意味着，马丁·路德对宗教社会的看法被推翻，加尔文主义者的新耶路撒冷被摧毁，中世纪以及教皇的理想被结束；它代表着人们头脑中进行的历史创造与上述一切相互矛盾。我们的思想应该集中于欺骗人们意图方面的历史进程——即那个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完全扭曲到不可预知地步的天意，这样认为并不错。然而，辉格党历史学家在濒临绝境时，仍会把一切归因于马丁·路德。他口头技巧的一部分就是要让这一点仍然成为路德的一个额外优点，即路德的奋斗目标要比他意识中的奋斗目标更加伟大；好像路德的敌人就不是这样似的，好像同样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这样似的。辉格党历史学家对发现历史中的中介感兴趣，甚至在他承认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含蓄。他的方法论有个特点，即他应该对中介而不是对过程感兴趣。这就是他如何实现简化的。

在找出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总图、在思想掠过节选历史的广阔领域时，辉格党式的谬误就成了我们特有的陷阱，因为这些谬误可能就是为了推动概括才发明出来的。可以通过精简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直到一种运动逐渐表现为简单的前进。要把历史变化归因于某种直接的、可触及的中介，就更加容易。我们称之为“原因”[‘causes’]的东西就是为惊人的即时性操作炮制出来的。因此，在我们形成总体纵观的时候，在我们把宗教改革放在历史的整个框架中时，我们就在更加广泛地突显出辉格党式的阐释，并且用最有力的线条绘出我们的图表。说到宗教改革，可以说，世俗历史学家们的辉格党式谬误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比新教徒作家造成的任

何神学偏见的影响范围更加深远。并且，这个趋势是夸大宗教改革，即使在对新教徒并不完全有利的情况下也仍然如此。要做到戏剧化，把路德看成类似反叛中世纪的人物，这很容易。把宗教自由与思想自由看成是他带来的，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通过证明他的整个运动如何促进世俗政府的兴起，或者同意我们当中一位作家所说，没有马丁·路德就不会有路易十四，以此来突出路德的整个运动，这样的做法很有诱惑力。甚至可以合理地声称，新教推动了资本家的兴起；而且从新教的道德观中演变出超过七个致命优点，这些优点已经为工业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各种条件；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高潮性的结论：“资本主义就是加尔文神学的社会对应物。”这样，我们完成了一个圆周，在现代社会背后看到了新教，我们加深了另一种视觉幻觉——认为历史由许多大分水岭切分，宗教改革是其中之一。有时，看上去我们把新教视为一个物体 [Thing]，一个产生于1517年的固定、确定的物体；我们牢牢把它握住，甚至把它作为同时发生的许多运动的一个起源、一个原因、一个根源；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非常果断，好像新教本身没有前例，好像它寻究大分水岭是一个谬误，好像承认一种进程的作用而没有假定某种直接动力的干预，会真的削弱我们叙述的力量。说到底，这个例子证明了为编写出轮廓分明的历史而宁可满足于半真半假这一事实。我们强调了某些内容，然而恰恰在我们自己的发现已经让历史进程变得有趣的环节上，我们停止了对历史进程的考证，结果就夸大了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这样，我们就得以采取辉格党的捷径，得出那些似乎惊人地不言而喻的绝对判断。

似乎可以说，假如我们正致力于发现中世纪世界如何转

变成我们所知世界的话，就必须透过新教及宗教改革，深入了解人类事件中的更深一层潮流，了解我们可能真正辨识但却几乎不能妄加评论的运动，了解一种主潮，尽管我们永远必须逐渐发现这种主潮，但这可能是我们进行历史进程研究中最终才能领悟的东西。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例如，宗教改革以前，世界上已有一阵风显然对国王一方有利，而且许多国家里的教堂尖顶上、官邸里、大学中、王室里有一百只风标随着这阵风开始转动，显示独裁时代的到来。的确，流行心理学中的某个小细节似乎也会清楚地显示出这种方向，就象国家宪法机制的某些更大的发展情况一样。另外，可以这样说，当人类事物中兴起这样的潮流时，它可以利用任何渠道来实现其目标——可以让任何别的运动向它自己的方向偏转。出于某些原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新兴资本主义都为国王的辉煌而服务。即使这些运动的起因具有完全不同的主旨——尽管宗教觉醒本身看上去不可能增强世俗君主统治教会的权力——但更深层的潮流仍然可能引导表面潮流，吞并它们以壮大主流。举个例子，也许正是由于王子们在权力及自作主张方面已在增长，所以就吸引宗教改革与他们结盟，这对新教徒以及国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中世纪世界转变成现代世界的巨大过程，将宗教社会转变为现代时期的世俗国家的过程，要比宗教改革本身范围更宽广，影响更深远，力量更强大。宗教改革也许远不止是这种过程的一种征兆或结果，并且假如说它仅仅是过渡时期的一个事件，我们的假设未免太过分。然而，假如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原因的话，他会显得非常武断。从新教诞生那一刻起，它就是历史迅猛发展变化的内容。它很快就转

变成某种几乎连其原先领袖都辨认不出的东西。尽管可以说，后来的新教徒仅仅解读原先运动的含义，事实上他们是朝着一个确定方向解读暗含意义的；他们找出路德原先没有而且也不会喜欢的含义，正是在这个转变中，新教才获得了已经耳熟能详的联想含义，这些联想用一些词来做粗略的标示，如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及世俗国家 [Secular State]。正是在辉格党历史学家把影响归因于某方面的时刻，宗教改革本身最明显地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假如这场运动造成了政治、经济或社会影响，这是因为它本身与那些好像几乎不可避免的势力缠在一起，假如它给那些势力施加影响，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服从于它们的机制。要作出新教以某种方式造成资本家诞生这样的暗示是不够的；只看到宗教与经济领域互相影响，这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看到历史真相被冲淡为平庸的东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新教徒及资本家当时被同一股潮流推向同一个方向。假如罗马天主教没那么听话，这不单单因为它是个古老而坚固的体系，而是因为同化性极强的中世纪天主教教堂已经变成了毫无同化性的现代罗马天主教，好像路德运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它与改革对立起来，甚至与时代更深层的潮流对立起来。另外，大概可以这样说，或至少我们应该给这句话留有余地，——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自己构建历史叙述而将之置于门外——即，由于宗教改革的原始特征就是重新使用宗教权威、革新宗教社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就是反叛改变世界面目的总体运动；然而，由于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历史迅速变化的内容，因此就受到了那种运动的影响，随后就给变成了它天生就应该拒绝的一些潮流的

同盟者。

假如我们把宗教改革置入其历史环境，假如我们采取将新教本身看成是历史的产物这样的观点，那就打破了分水岭。但是，这里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我们站在比辉格党异端更为亵渎神灵的边缘上，因为我们可能坠入相反的谬误，说宗教改革根本什么也没有做。假如新教发展的根部流动着一个更深潮流的话，那就再没有比仅仅对这种运动进行肤浅哲理谈论或甚至比过早发现它的历史更为肤浅的了。如果把它看成历史背后的一个自立自决的机构，不管事件的本来发生情况而向其目的努力，那就再没有比这样的看法更加草率的了。大概可以用这种看法来证明宗教改革在世界上没有起到作用，证明马丁·路德并不重要，证明时代进程没有受到任何可能发生事件的影响；但即使这些是真实的，历史学家这样说也不是有水平的表现，而且无论怎样，这种教条就是彻底否定历史。这种教条将会是，认为历史事件的整个领域丝毫没有任何意义。这与辉格党的过度戏剧化恰恰相反。我们所讨论的深层运动没有把一切解释清楚，或根本什么也没有解释。它无法脱离历史事件而存在，也无法与历史事件分开。也许除了知道它的存在以外，历史学家对之也无能为力。有一个谬误需要避免，而且它再一次与辉格党式的谬误相反。假如宗教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原因”，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它仅仅是一个“结果”。就象人类思想一样：尽管我们发现其中有各个方面的历史先例，但是至少就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能力而言，我们不能否认还产生了其他不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的不是起源，而是调停，但研究的是那些真正推陈出新而且让历史学家必须视为崭新内容的有效调

停。实质上，就是研究过渡，而且对历史学家来说唯一绝对的就是变化。

宗教改革居然提供了无数种有趣的这类调停，原因有很多。仅仅在 16 世纪它通过造成一种巨变就向熔炉里投入了许多问题。仅凭它所造成的战争与争论的强度就可断定，它一定已经加速解决了各种势力与各种思想的众多冲突。根据它创造的新环境以及所产生的不安定，可以得知它一定已经为许多重新融合的思想提供了特别渠道。社会上存在各式各样的大变动、造成如此之多重新构建的这一事实，在许多国家里就一定已经阻止了稳定、悠久的机构对历史上存在的任何潮流所作的坚强反抗。由于上述所有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宗教改革是人们可找到的用以研究时代更替所依托的众多调停当中——为的是考察一个历史过渡时期——最有趣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宗教改革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过客，还可能是一个同盟者，为我们认为已存在的力量施加实际影响。这样，结果就会与辉格党式的历史迥然不同，因为那种微妙的暗示就会少一些，即认为 16 世纪的变化可以通过参照新教的性质或本质来解释。更多的余地将会留给对这个全部过渡时期的评论，诸如，仅仅根据宗教改革造成了巨大变动这一事实，就知道宗教改革注定要在生活各个方面促成更迅速的转变。假如说，在这一争论上，宗教改革仅仅把舞台让给那些已在运作的那些势力去发挥作用，因此仅仅作为障碍的障碍来服务——假如我们必须进一步承认自己没有权利否认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天才及他的个人成就——这里我们可能同意辉格党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甚至可能说，从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给历史带来一些新内容；不过即使在这点上也有微

妙的差异。我们无法想象路德是凭空捏造；我们历史研究的条件是，即我们应该发现路德所说所做的一切在历史上的先例；路德自己仍然是历史调停的一个范例，他完成的其实是一个过渡工作，将旧内容带入我们可以公认的完全崭新的内容中去。可以这样假设，假如按照这种方式研究历史的话——不是作为起源问题，而是作为过渡问题，不是作为“原因”的对象，而是作为“调停”的对象——那么历史阐释就不会那么辉格党式，变化也不会显得那么惊天动地。历史会失去诸如下列说法中至少暗含的一些矛盾：“资本主义是加尔文主义神学的社会对应物”；历史学家的世界就会更像现实世界一样。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会导引我们认识到，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宗教运动，正如它原先的领导人曾经那样认为的一样。我们应该发现，假如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内容由路德来承担，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学家的视觉幻觉、撰写历史技巧中的某些特征，以及运用已成为历史学家惯用的让人质疑的术语。最终我们至少应该做更多的准备认识到，正如在生活中，在历史上作为宗教领袖的路德必须凭他的天才以及真实来让世人决定他的成败。假如宗教改革产生了经济或政治影响，我们应该更有所准备地看到，这是因为它与已存在的趋向紧密相连，而且实际上它并没有象有时假设的那样让这些趋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或者偏离。

最后，涉及到批评辉格党历史学家过于直接参考现在而研究过去时，可以说，他的方法步骤实际违背了他最先表白的利用过去来澄清现在这一初衷。假如我们仅仅因为发现了现今世界已有的某些事情而在历史进程中寻找它们的话，假如我们只抓住 16 世纪与我们 20 世纪所知事情最为相似的那

些内容，我们全部的历史结局就只能是最最终把我们送回出发点，来修正我们最初认识自己时代的所有观念。我们是否在研究历史的开始已经假设并且把它作为参照基础，或者是否我们等待、推迟下判断直到最终发现结论，这都会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17世纪那些过于直接参照大宪章来研究他们自己时代的争论者，并没有通过利用过去以便更好地洞察他们自己的时代，而是循环争论，也许他们挺乐意这样，让他们的历史证实有关他们所处现在的一些错误观点。假如我们把现在变成一个所有其他时代仅仅与之相关的绝对物，我们无论如何就失去了历史所能赋予的对我们自我更真实的认识；我们没有认识到在那些事情上我们也只是相对物，因此就失去机会发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观念与偏见在历史长河上的位置。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并不完全独立存在或不受任何限制，而是宏伟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不仅是开拓者，而且还是事物运动中的过客。

四 历史与价值判断

历史已经从吟游诗人和传播历史者手中脱离出来，人们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来加强对自身以及对自己在公众面前位置的理解——对我们倾向于要做的以及正努力去做的事情有更清楚的意识。甚至看上去，我们可能过多地信奉我们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并且似乎已经让我们思考历史时带着更多的热情，而不是更多的判断力。如同其他专家，历史学家很快就逾越其研究范围，并从历史中引出超出历史真正所能给予的内容；他永远受到诱惑，企图让他的叙述有结局，让他的判断成为盖棺定论，而这个定论既没有得到研究材料也没有得到研究过程的保证。在辉格党历史学家的所有谬误背后，隐藏着一种要得出价值判断的热望，希望历史回答各种问题，裁决各种事件，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有关争论的最后定论。他以为，除非他能给出裁定否则他就没做到完整；研究 16 世纪的天主教与新教的过程中，他感到除非他能证明哪一方是正确的，否则就一切悬而未决。他希望得出一个总定论，这个定论可以当作经历史验证的真理，当作能脱离与特种历史事件相关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对之进行单独考虑的一门课；除

非他能得到这样的东西，否则他认为他所研究的内容没有结果，认为他仅在过程上浪费自己的时间，认为他只是为观察而观察复杂的情况和变化。然而，他似乎轻视的这一切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引出普遍真理，或者引出声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总定论，这不是历史所能实现的最高目的。

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具体的事情，在由事实、人们、以及事件组成的世界里无拘无束。时间与场景相互作用织成的网络对他来说就是一切。偶发事件、事态以及事件的奇怪组合正是他叙述的内容。他的所有艺术就在于重新抓住一刻，紧握特殊事件，重点分析一个偶发事件。专门热爱原理本身的理论家，可能会自由地谈论上述内容，因为可以说，他谈论时是脱离实际的；但历史学家必须将这些原理落到实处，因为他只在其他人的生活背景中研究这些原理；他必须看到原理夹在机遇与偶发事件之间；他必须看到他们的逻辑在具体世界的事件中受到戏弄，相互纠缠。历史学家本质上是观察者，关注着发展的一切。象游客一样，历史学家为我们无法亲临其境的人描述一个未知的国家；象游客一样，他讲述的是伸手可及的、具体的、特别的；他不太关心哲学或抽象推理。假如他过于哲理化，他可能会因其份内应该注意的一切事物所带来的浪费、重复及琐碎而丧失耐心，可能会像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事件上。历史的确是一种类似导游书的描述性写作。它关心的是生活过程而不是生活意义、目的、或目标。它感兴趣的是各种理想如何推动人类，怎样促使事件的转折，而不对理想本身最终的合法性感兴趣。可以说，历史学家关心的不是光与光的本质，他研究的仅仅是光消散在外部世界的折射——他

感兴趣的是考察其颜色，他关心的是整个颜色世界。他受到的训练及思维方式以及他的所有研究方法，让他紧紧抓住特殊的、具体的，使他在本质上成为外部世界事件的观察者。因此，通常历史学家对事物本质考虑的极少，甚至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内容也是如此，他们确实对脱离现实的推理有种不信任，他们自认为这是健康的。一般说来，他们已经很满足于接受有关历史在知识体系中地位的现有观点，满足于草率地用常识处理那些出现的问题，满足于根据其他艺术及科学作出相当简单的类比。他们只批判性地考察了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且将它放在一个科学基础上，这就是具体的方面——即使用资料以及权衡证据——无论在组织历史叙述方面，还是对他们研究内容作出推理的过程上，他们在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方面并不特别认真。他们一旦离开具体世界，开始进行一般推理，就不高兴了。

历史的价值在于它对过去具体生活复原的丰富程度。这样的叙述不能讲得索然无味，它的含义也不能通过一种几何图形来传达。历史中没有哪一种重要内容可以通过蒸发人类及个人因素、偶发事件或短暂事件或当地事件、以及非主要因素来取得的，好像根源处存在着绝对的东西，某种独立于时间与场景之外的真理。究其根源，可能有一种新教的本质与公式，但是宗教改革历史中没有一种本质或公式能代替整个历史地位的。历史学家描述过去的时候，他必须抓住精彩的历史时刻、人性、外部环境的情况、以及事件的含义；他非但不把这些扫开，而是积累起具体的、特殊的、个人的内容；因为他研究的是变化事件的变化，而不是永恒的山脉和星系。要在完整、丰富、具体的意义上恢复马丁·路德的个

性特征——当然包括某些人可能认为是偶然事件及非本质的内容——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目标，而且其本身就是目标；这里，不符合历史的做法是，想象我们能撇开偶然事件找到实质；这样做是把路德当成一种公式、“新教的创始人”、“宗教自由的改革家”来看待的。钻研历史的整个过程是一个迈向研究历史的运动——它把我们从普遍带向特殊，从抽象带向具体，从持有宗教改革导致自由的论点带向实事求是地看待产生现代世界的所有机遇与变化。

譬如，公元4世纪代表的是一个发生着重要事件、异教完全衰落而基督教刚刚取得胜利的时代。显然，这些年里正在提出并解决了许多重大的易察觉的人类问题，显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特别人际关系，让生活和经历感受到特殊的强度。我们禁不住要问：在人类摈弃旧秩序，改变信仰，培养新习惯，适应新生活之时，他们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了解这样一种人类危机如何体现在个人心灵、家庭中、城市村庄里、以及朝廷中，一定很有趣。人们怎样看待接受主教的指引甚至谴责、然后拒绝为崇拜远古偶像的服务提供政府援助款的这样一个国王？正在衰亡的异教与正在兴起的基督教之间的和解 [*rapprochements*] 是什么性质？基督教徒从异教的仪式、节日及观念中借用了什么——有多少是有意识的？多少是不知不觉的？在年轻人忘记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时，老年人是什么感觉？而且后来，当邪恶降临时，一些人难道没有带着疑虑接受基督教了吗？很容易把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争斗看成是各种势力的一种相互作用，并且姑且说，在抽象地谈论这个争斗；但把它看作是受四面八方影响的性格与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则更加明确；假如我们能接受开始所作的一般声

明，仅仅接受发生在这个时代的公式，并探求它具体的影响方式，直到我们发现它与哪些细节不同，了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有多么多样化，即使是它所产生的附带行动也会有多么地令人吃惊，它暗含的复杂性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中暗含的含义有多么的丰富多彩，那就更有意思了。历史学家就是指引我们离开一般观点的世界，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对时间、空间发生的一切进行哲理解释。的确，他写的任何历史都应该能够接受生活本身似乎能够接受的各种哲学阐释。作为最后一招，历史学家对已发生事情作出的解释根本不是一种普通推理。他通过准确发现所发生的情况来解释法国大革命；假如我们随时需要进一步阐明，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让我们了解更多的细节，让我们更确切、更具体地了解实际发生的一切。这样做的同时，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发现我们永远也不会推测到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理由；是历史研究的传奇。纵观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普遍原理寻求推断事件发生的确定原因，但是这种思辨与对马丁·路德如何作出伟大决定的细致具体的考证之间有天壤之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由于过于缺乏耐心的历史研究而编成的通史周围总是萦绕着不真实的气氛。历史研究的结果恰恰证实了我们闭门造车的谬误——证实了与实际发生的令人吃惊的事物相比，所有这类推测有多么贫乏。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稿与资料的激情不是渴望确认事实、日期或更正历史叙述中偶尔出现的错误，而是渴望让他自己在各种特殊机遇及变化的条件下与事实建立真正关系——渴望亲自看到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历史学家的最后话语不是精确坚决的普遍声明；而是一种详细的研究。

它研究的是我们所能作出的任何概括背后的复杂性。

首先，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作出所谓的价值判断。他可能会努力证明人们如何在宗教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无法在各种宗教之间进行裁定，正如他无法在哲学体系间裁定一样；尽管他可能证明一种宗教在实际社会中要比另外一种宗教更受欢迎，尽管他甚至可能认为他已经证明了（这更加困难）一种宗教经过时间最终考验一定要更好一些。但他也无法用未经验证的假定来估计相对可被视为精神与永久收益，物质损失有多少。他的职责是描述；他保持公正态度站在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中间；他对两种宗教都不感兴趣，只对它们与人类生活密切相联这一点感兴趣。尽管他可能会描述出（如果他能理顺的话）宗教法庭给现代西班牙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他甚至可能会证明宗教法庭在某种意义上使西班牙退出了强国之列，但他仍然没有证明这对幸福是致命的，而且他也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说明什么是好的生活。结果是，所有西班牙人可能会反驳说，剥夺他们地位的宗教法庭是从前赋予他们名望与影响的机构；历史学家应该受到激励来进一步探索，询问为什么在一套条件下宗教法庭曾帮助西班牙成为强国，而在另一套条件下却导致西班牙倒台。当他带领我们摆脱简单绝对的判断时，他就回到了他的职责范围内，然后通过回归历史背景，把一切又缠绕在一起。当他根据具体情况，根据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好是坏，他就回到了他的职责范围当中。假如历史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提醒我们复杂的事态，会逐渐造成破坏，使我们无法下定论，并向我们证明我们所有的判断仅仅是相对时间与环境而言的。

反对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中有一个论点似非而是，也与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相矛盾，因为它去除了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是历史的优点及历史实用性的内容，它剥夺了历史学家最犀利的观点及最宏伟的权威感。它存在于一个事实，即我们永远无法肯定地说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人最终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无法说，最终问题、事件的后续过程，或时间的流逝已经证明路德是正确的、教皇是错误的，或者皮特是错误的、查理·福克斯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路德行为的最终影响已经证明他的目的或行为是正确的；因为现代世俗世界并没有证明路德的主旨或他对一个宗教社会所抱的理想是正确的，就像它没有证明教皇的中世纪理想是正确的一样；无论如何，我们无法计算出路德行为的最终影响，除非我们希望模仿中学生在描写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带来的影响时，列举出诸如处查理一世极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Spanish Succession]，以及法国大革命等等事件。通过辛勤工作，我们也许能找到路德反叛在路德自己时代中所带来的取代；我们可能会从每个时代的过渡时期中大致抽取出一些原因与结果；但很快就无法发现更多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路德行为的结果与造成那个时期变化的其他一切所带来的结果都纠缠在一起；我们只能集中对待整个新环境，观察新的事态正在产生的新取代。我们最多只能说，假如路德在他的时代做错什么，那么这种因他而造成的恶果，是未来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部分情况；只能说他的后人在研究问题的新情况时，会重新定位目标，让一切仍旧为好的事物努力地服务，尽管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不得不再成为他们决意要得到的好事物。当一个时代的罪恶与错误已使得人们无法生存在世界上的时候，在下一

代正努力让生活重新变得可以忍受的过程中大概只能放弃曾抱有的理想，这样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寻觅新的梦想与目标。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面是，新一代的工作永远扮演天意，甚至来预见旧时代的灾难，并且仅仅因为旧意义上的生活已变得不可能而被迫变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举措。假如历史被简缩成辉格党式的历史节选，它代表的是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种复杂情况。因此，当辉格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譬如，因为宗教改革最终带来自由所以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们必须避免受到诱惑根据上述说法作出似乎是明显的推理；原因是，有可能反驳辉格党历史学家说，他所称赞的重要话题仅仅来自于这一事实，即从宗教改革带来的直接后果来看，宗教改革对自由来说是灾难性的。

宗教改革常常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的结果与继续——是开拓人类思维的平行运动——也可以被看作在世界上重新维持宗教势力，对世俗化、时代的松懈与罪恶的一种反叛。在我们看来，路德非常像一个革新家，一个对既定权威的叛逆者，实际上是宗教领袖，从一种意义上说是复古主义者，他的反叛仅仅是他努力在世界上建立正确宗教的一个小插曲。路德与加尔文非常相似，因为他们都攻击了教皇与中世纪对宗教社会的观念；但他们为之奋斗的圣经联邦 [Biblical Commonwealth] 在控制个人方面是否不那么严厉，或者假如不那么严厉，是否会被这些人接受，这就令人质疑了。尽管圣经已被证实是权威当中最灵活多变，也最能促发进步的解释，但它还有待证明以下事实，即用它来反驳教皇的那些宗教改革者们没有把它当成比罗马传统或者教会法规更坚定、严厉的权威——这些法规中，他们谴责的似乎正是各项革新与发展。

路德在进一步解释宗教教义时，没有受到阻碍，相反却得到了天主教会上级阶层的慷慨鼓励，而且当他像多数同时期的布道者一样在布道中呵斥对特赦的普遍态度时，他没有受到骚扰。可以说，促成与罗马决裂的这一行为，正是由于路德自己不能容忍别人信的错误宗教（他这样认为）造成的。可以说，路德反叛的不是教皇的严厉，而是教皇的松懈。

不论怎样，16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有关上帝方面的严重错误几乎都会被一致认为是亵渎神灵的，政府与世俗的统治者无法想象宗教上的不墨守陈规可能与社会秩序一致；一个重要的神学争论被专门用来让宗教变得好斗及狂热。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在16世纪一场规模庞大、并暗示着天主教会分裂的宗教运动几乎会让整个大陆血流成河；要是因为相互作用而导致它引发罗马的宗教狂热复兴，更是如此。要得出以下结论在所难免：路德与罗马天主教教会政体 [Papacy] 的决裂——教皇本身对此负很大责任，因为他们似乎决意要促使他来反叛——给下个时代产生了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给生活和社会造成可怕影响。我不知道谁可以否认，宗教改革挑起了宗教热情、宗教狂热及宗教仇恨复发，这些都与1500年间事物似乎在朝前发展的那个世界并不相同。当我们思考伊拉斯谟 [Erasmus]、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以及文艺复兴精神的时候，至少必须想一想，假如路德从未让激进的宗教复兴过，思想自由及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是否会更加顺利。即使可以说，整个世纪内毁坏许多国家的可怕战争无论如何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所持的明显的宗教原因，但毫无疑问，宗教赋予了他们狂热与强度，而且引入了既没有帮助澄清其他问题也没有让他们增强调和能力的宗教因素。要否认

这个时期内宗教狂热的真实性，正如把所有恐怖与罪恶都归因于罗马天主教的邪恶一样，都会是一大错误；因为，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路德、加尔文以及教皇共同持有、并且同样坚信的那些观点，即认为社会与政府应该建立在一个权威宗教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思想都应该由宗教来统治，认为在这样的宗教社会中不能允许异端学说、亵渎神灵或者违背上帝的恶劣行为抬头。不论是因为对宗教权威的一种看法（这种观点与他们对社会的基本假设有关），还是由于他们信奉迫害（这可能仅仅是他们宗教信仰的另一反映）而攻击路德或教皇，都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说，当这样的观念深植于几乎所有信仰宗教的人们脑海里的時候，类似宗教改革的运动与目前公认的稳固权威直接作对，必定会在尘世间导致灾难性后果。天主教徒对宗教纷争的悲剧及毁灭并不完全负有责任，我们只能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一样，为实现共同的假定，由于它们的冲突，由于它们共存于一个社会与基督教世界里，而引发了恐怖得无法想象的战争、痛苦及灾难。

假如我们将视角重新定位，集中精力研究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个面临众多新问题的时代，特别是遇到由于一个社会共存两种宗教而产生的古怪问题——我们应称之为少数宗教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正在尝试着新的试验——正在作出一种巨大努力使生活变为可能，重新可以忍受；看到人们因为无法逃避教会与社会应该共存这一基本假设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几乎是非常好笑的——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政府除了不能做唯一真正信仰的第一仆人之外，什么都可以做。宗教若被看成属于个人的一种可选物，教会若能被当成国内志愿团体而得到承认，要等到这一天，还任重

道远。英国的伊丽莎白企图通过采取**中庸之道** [*via media*] 来达到“理解”，以使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宗教组织来覆盖全国。而卡特琳·德梅迪西没有达到理解，愿意尊重一个少数宗教，有点儿把它视为一个变异来对待，几乎视之为“国家中的国家”。有时，采用信仰自由来缓解问题，这种信仰自由首先常常被看为一种临时政策——一种企图实现**权宜之计** [*modus vivendi*] 直到完善教会的努力。像法国政治党 [*Politiques*] 之类的政党可能仍然认为，迫害就是宗教理想，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理，但又相信宗教迫害不能以大规模开展屠杀，并且说国家不应该因为宗教而毁灭。随着斗争的发展，国家找到机会上升为判决者的地位，而宗教团体倾向于接近国家内部冲突的各个党派；世俗政府非但没有把自己看作唯一真理的仆人，也许甚至以社会利益的捍卫者自居，把和平强加于各宗教党派。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宗教自由就随着对宗教漠不关心的回归而出现。它是作为一个世俗理想出现的。它重新声明社会及世界有权利反对那些宗教通过战争以及宣称内容的绝对性，不计社会后果地开展着活动。英国的伊丽莎白，卡特琳·德梅迪西，威廉一世（沉默者） [*William the Silent*]，华伦斯坦 [*Wallenstein*] 以及在任一国家采取政治党态度的所有那些党派，纷纷企图通过让宗教服从政策，来医治时代的伤悲，消除宗教改革的悲剧。他们因为过于世俗，所以帮助了自由事业，从他们时代的视角来看，他们也许太邪恶，不能支持任何宗教来无视社会影响、不顾政治利益。

但是宗教团体本身始终在变，而且受到世界上各种变化的影响。从一开始，所有党派都为反对专制的教会、争取良

心的自由而呐喊；每个党派都攻击其他党派的迫害；但是作为少数派的新教徒在许多国家里兴起后在这方面的抗议经验更加丰富。一些人最终一定会这样认为，所有的迫害，即使代表真理的那方，都是邪恶的。圣经成了比路德或加尔文曾想象的还要流动还要灵活的权威。新教分成了更多的分支与党派，远远超过其原先领导人所愿意见到的。这些派别在教皇的威吓下，不可能永远互相迫害下去。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更可能认识到宗教各种形式的相对性，把教会组织看成是实验对象，把教义看作调查对象。新教徒开始互相接受各种宗教，尽管多数人多年后才能接受一个天主教徒。出现了例如英国独立派的观点，它倡导允许国内宗教多样化的公理会制度。信仰自由一度曾是世俗政策，一种政治需求，如今变成了一种宗教理想。教会开始成为国内的志愿社团。它没有采用作为统一一致的宗教团体，即路德、加尔文、再洗礼派教、英国国教、罗马天主教的政府旧理想——相反出现了宗教自由原则，认为世俗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愿加入或不加入任何宗教团体，认为一个政府一定不能干涉人们对教堂或宗教的选择。最初的新教徒已经把新激情注入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国家理想中，他们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严厉地根据圣经的模式来治理这个团体。以后的新教徒彻底改变了基本目的，成了个人主义与世俗国家的同盟军。

从根本上说，发动人们参与改变这个目的、修正理想的是宗教改革这一悲剧，这个大破坏是由同一社会并存的两种宗教形式造成。因为宗教改革的结果给生活和自由造成了如此多的灾难性后果，人们才被迫重新审视他们的原则，甚至被迫改变宗教理想。事实是，假如某个时代人们正在激烈争

吵某个宗教宣称的内容，这个大破坏可能会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人们会滑入新问题的一个世界，注意力也会转向新的问题。让下一个时代不安的问题将是如何保证某种宗教和平，如何至少设法不让宗教争论把破坏扩散到全世界。辉格党历史学家假设事件发生的延续性，这是错误的，他忽视了问题的这种转变，对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视而不见。他喜欢把宗教自由想象成从新教中漂亮地分流出来，而实际上它怀着痛苦与积怨诞生于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来自后宗教改革世界的悲剧。他设想在此之后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路德是正确的，但事实上是路德之后的几个时代完成了调和工作，是灾难本身促使人们后来在行动上更有创造力。辉格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的进程，几个世纪过后，可以判断一个人、一个时代或一种运动。实际上，历史在这方面只能说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如此普通以至于几乎都成了一种赘述。也就是，发生的那种灾难并不是完全不能挽回的——只要一个时代没有被销毁，或一个国家没有从地图上完全抹去——就不会存在一旦发生罪恶、错误或灾难后面的时代不会最好地加以利用的这种情况；尽管发生了灾难或天罚，也许是黑死病，或伦敦大火，但人们仍然会心甘情愿地做非做不可的事，把旧世界的倒塌作为创造新世界的机会，直到辉格党历史学家回顾这场灾难时，只能看到获得的利益及令人欢欣鼓舞的调整。因此最后的结果是，辉格党历史学家将受到诱惑，忘记一个时代的痛苦，将轻易地断定原先的悲剧根本不是悲剧。现在我们可以感激 16 世纪的宗教争论，正如我们感激黑死病及伦敦大火一样——因为正是这些灾难促使人们作出相当于一个有创意的行动；而我们在几个世纪

的余波之后，看到的仅仅是所产生的有利之处。但是，假如我们否认在路德反叛天主教教会而教皇故意唆使他反叛时他们没有造成一个意味着要牺牲不止一代人的悲剧，那我们就受到了错觉的欺骗。

五 历史学家的艺术

人们可以反对说，为反对辉格党式阐释而创立的历史观点代表的是最单调的事情、是没有偏见的、对任何人都不偏袒的历史。过于竭力做到思想开阔的，在这一点上就只能努力做到平淡无奇。历史学家假如仅仅因为怕说错话而被控制，那他书写历史会受到太多的压抑。也许真的做不到公正，并且已经实现公正这种表象只是所有幻觉中最大的一个。也许即使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目标本身远远不是理想中的；因为假如历史是一个不涉及我们感情的世界，似乎想象力就无法得到发挥。一部历史作品的确可能是一堆单调乏味、毫无生机的材料，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似乎只是在抄写详细的卡片索引——好像他们自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似的，好像在内容与主题之间没有可执行的调停工作。很容易忽视或错误地描述历史学家为我们理解过去所作出的贡献。也容易忘记，历史学家的艺术中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即有创意之举。历史学家的责任绝不是只把自己变成一张透明胶片，绝不仅仅简单地以乏味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公正来抄写信息。

通过类似历史想象的创意之举我们已经发现了怎样理解

中世纪，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把那个时代的生活条件变成有形的东西，学会了如何对事物有不同感受，以辨清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内在联系。我们与文艺复兴时期及 18 世纪的思想家不同，这不仅仅表现在我们对这些中世纪时期的认识，而且表现在我们确实已经作出了理解历史的努力，表现在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正确的、必要的。历史学家不仅仅是观察家；因为假如他只是观察家，他会是一个很不称职的观察家。从一种特殊意义上说，他出去迎接的是过去，他的工作不仅仅是思考，而且是个性的一次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 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国民誓约派成员 [Covenanters]，托马斯·卡莱尔也已为我们评价克伦威尔 [Cromwell] 作出了一个重要贡献。历史学家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外界旁观者。如果仅仅是让他能够抓住重要细节，辨清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互相牵连着的 facts，那么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通过想象中的协调，他把过去给现在阐释得一清二楚。他把过去的一些制约条件转译成我们今天可以明白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必须总是从现在的角度来撰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时代都将不得不再次书写自己的历史。

有一种意识只能来自于洞察、同情与想象，当我们过于警惕一种纯粹科学目的时，我们也许没有这种意识。假如我们只是阅读手中文件的字面意思，并由于我们缺乏历史感而没有领会这些文件的影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意识。要抓住历史与生活的弦外之音，读懂字里行间的意义，贴近我们主题的人性一面——针对这个主题，假如思想不随着同情与想象一起运转，我们的思想可能会过于机械——要做到

上述一切，就有必要有点儿这种意识。要理解我们近邻的生活方式，总要有点儿艺术，并且无论我们在心理方面有多高的造诣，要看明白心理学对任何一个特定人的关系，我们都需要一种类似悟性的东西。假如历史学家的公正意味着漠不关心的状态下有明知，所有激情都消失，那么这种公正就会受到谴责。我们研究过去要发现的不仅仅是事实，还要发现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保持本能和同情的鲜活，让我们的所有人性保持清醒。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性资源中调动那些转移科学家思路却综合起来去丰富诗人思路的一切事物。

不可否认，辉格党历史学家已经相当好地执行了他的这部分职责，不过他是为可以被描述为历史叙述的一个侧面而做的。许多时候，他自己的假定已经促使他寻求理解历史；他对历史过程的个人看法，已经为他提供了那些唤醒想象力的同情心；他倾向于捍卫的那些论点已经促使他足智多谋，并且他已经学会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成置身于统治他人生活的决定条件之中。辉格党历史学家就是情感驱动力的一个实例，这种动力是必要的，它让我们质疑那些似乎是事先定好的结论。辉格党历史学家就是证明以下事实的一个例子，即偏见与激情本身可以为理解历史作出一种贡献。但事实上，新教徒已经能够想出办法为路德所支持的迫害作辩护和理解，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用的那些论点，正是教皇迫害控制下的辩护武器的部分内容。反对辉格党历史学家的原因在于，他停止了对理解历史所作出的努力。他恰好在几乎可以用一个模式解决的时刻停止调动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最近时期的专家工作，更多的足智以及更多富有想像力的工作都用于阐释辉格党人、激进派、甚至过去的

改革者，而在阐释托利党、保守党和反动派时并没有这样。在那些最需要努力去了解的人物身上，辉格党历史学家却停止了努力。

如果历史不撒下更宽的网搜寻真理，它就永远不会令人满意；因为假如它一方面研究变化，那么它研究的另一面就是多样性。历史学家像小说家一样，必定会因为众人组成一个世界而感到高兴。像小说家一样，他只能对一种人感到遗憾——最无聊的那种——并且小心翼翼避免把这种人描述得过于真实。对于其余的，他都可以利用。他最大的缺陷将是，缺乏富有想象力的同情，无论是拒绝努力去理解一个苏格兰人，还是拒绝把他所有的人性都投入理解一个耶稣会会士 [Jesuit]、一个暴君或一个诗人。辉格党历史学家的狂热往往来自实际上的移情，把对现在事情、对民主或思想自由、自由传统的一种热情转移到过去。但是，真正的历史狂热是为过去而热恋过去。这种狂热就是在吉本 [Gibbon] 与格列高尔维斯 [Gregorovius] 目睹古罗马的废墟后才在他们身上唤醒的。在其背后，正是一种理解人类多样性的激情，在与现在不同的事物中研究一个过去时代的欲望。真正的历史狂热是这样一种人的狂热，对这种人来说，发挥历史想象力带来了好处，这种狂热表现在对一种更深层理解的那些暗示，对一种新的阐释性真理的那些肤浅了解，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的贡献以及他的审美愉悦。

对本文已提出的历史观点的进一步反对意见，将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根据该论点的所有暗示，它似乎是一种不可能缩减的历史。可以说，有一种感觉认为历史无法真正得到缩减，就象无法节选贝多芬的一个交响乐一样，而且历史研究

问题的所有困难似乎确实都来自它所节选的内容这个基本问题。假如可以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及细节讲述出来的话，历史将给我们提供象生活一样混乱难解的内容；但是由于它可以得到浓缩，因此一切似乎都可以变得简单一些，由于我们选择忽略一些内容，就造成了混乱。假如我们记住历史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与我们在思想中把一种通史结构作为参照体系有关的话，那么这种恶果就变得明晰可见；这是依据一种节减后的历史版本进行广泛推理后的结果。在这种讨论中，思维不严密的人会得出确切结论，并且得出似乎有终结性的判断，而一种更为细致的思考本身可能不会得出很多结论，结果可能只会是尝试性的、不确定的。作为一门大众学科研究的对象，不论通史有什么价值，都会由于它以这种方式对不严密的思维实际作出高度评价而被大大抵消了。他会由于它轻易让我们涉猎宏伟的领域、并且让我们讨论重要话题而对大脑产生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它给那些谬误不能及时得到发现的更重要的推理提供了很大空间。它允许我们可以从它的所有分支中寻找一种极易获得却又非常危险的智慧，即“事后诸葛亮”[‘after the event’]。可以说，历史研究的传播已经在世界上产生了一种新形的无稽之谈，一个由似是而非的归纳与模糊不清、貌似有理的内容所构成的新领域，创建于以前不为人知的混乱思维，特点是大胆处理并不代表任何可以得出真正具体中再现的东西——整个来自一个过于重视节选后的历史过程。这种认知在历史中以及引申研究中为辉格党人创作了奇迹，这绝不仅仅是偶然。

当辉格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宗教改革导致自由，他可能言之有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理由根据这句话进行

任何推论。作为历史学家争论的结论，这样的说法也许有其位置，但假如我们把它当作我们论证的出发点，就不是一般的危险了。抓住类似这样的说法，带着它出海航行，企图发现凡是可想到的逻辑外延，这对思维来说颇有诱惑力。我们忘记了一点，即论点本身代表的是历史学家可能有充分理由在最大的逻辑外延内考虑他追求的思想。我们带着它飞向天空，而实际上它需要脚踏实地；它应该服从于一种将揭示其潜在复杂性的内部分析。一个比较大的危险在于，思维在广阔的空间驰骋，对历史学家的那些半个真理加以利用；因此，真正的历史研究注定成为细致研究，把我们与我们所节选的内容分开，不是向上追求模糊不清的推断，而是脚踏实地寻找具体细节。现在，假如我们证明自由来自新教，我们中会有人急于认为，现代自由的发展来自新教本身的体制，他们的逻辑将会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思考的将是现在的新教。最好的办法是，至少证明自由来自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只要是因为这种说法意味着复杂性及相互作用；它让许多事情悬而未决，并且提出了一个只有经过更加细致的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尤其善于归纳，进行模糊的哲学推理；但根据这些特点，就可以说这种推理建立在一个危险的基础上。

节选历史这一重要工作常常留给了教材编写者以及商业文献的职业生产厂家，这也许是个悲剧。可悲的是，许多对历史的节选实际上根本不是节选——不是对一个完整思维的压缩，只是对其他节选进行汇编而已。这样，节选似乎常常会被认为可以删去一些复杂情况把历史精华讲述出来的这个假定所歪曲；这个假定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历史是一个由永

远相连的无数复杂情况构成的整个网络。节选也许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基于某个筛选原则，就象把几个世纪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构建于其实是一个指导性原则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基础上一样，这样做有危险。所有的节选由于省略了一些内容而获得确定性，因而清楚地回答历史研究目前尚无法清楚回答的所有问题，这样做有危险。最后，我们也许把推理的重担过多地压在了历史学家的一般说明上面——所有丰满优化一切的说明都已被全部删减得荡然无存，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有危险的。这些都是对节选历史的滥用，但说到底它们仅是滥用；它们证明了历史教材如何可以教授与历史本身相反的内容，它们证明了为什么历史可以经常变成宣传；但是它们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从来就没有一部历史没有经过大量节选的，而且它们的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实际编写工作中，历史学家的艺术正是节选的艺术；他的问题也是节选的问题。

我们有权要求他做的是，他在节选历史过程中不能改变历史叙述的意义与主旨，在选择及组织他的事实时不能篡改一种理论，不能给事件插入新的模式，尤其不能加入把所有叙述细节都讲述完也永远不可行的那种模式。如果历史体现出的总体印象是由导致现代世界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那么节选可以随其自愿要多简单就多简单，但它同时也必须是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复杂阐述。的确，历史学家在挖空心思寻找一种本身可以暗示其潜在复杂性的一般声明时，他是最标准的历史学家。节选问题就是节选一种复杂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填补或者淘汰哪些内容的一个机械性问题；它还是一个研究如何在不失去主旨与含义的前提下减少细节的有机问题。所有的节选都是一种印象主义——尽管历史学家可能最

后一个意识到这点——而且这意味着有天赋、看清主要细节、发现事件之间的和应作用、理解历史进程遵循的整个模式。这不是根据某个抽象原则来挑选事实；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抽象原则就会受到质疑，我们就应该有权利把自己喜欢的任一模式强加于历史叙述。挑选事实的意图在于维持这种印象——尽管有所省略，但仍然维持全部的内在联系。当某个历史时期的主人已经把他对事件影响的理解以及他对事件相互作用的阐释浓缩成几页的时候，就已经以节选后的历史形式完成了伟大的工作；并且已设法把构成时代脉络的历史进程的成分成功地传达给了读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认识了他的历史美德何在；并且在他的节选中他仍然保持着时代脉络。

最后，以下说法可能会有人反对：没有什么能比阻止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评价历史更为痛苦的了；历史学家有权来判断，尽管这些可能只是一种离题；假如我们不允许他痛快地表达出他的附带意见 [*obiter dicta*]，就会让他受到委屈保持沉默。他有权利对某个人或某个事件表示特殊的关怀，如果仅仅是为了制造出一个精确的时代；他着手发起谴责的行为是合法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让读者对他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他对生活、政治或人物的评论在价值上将与其洞察力成比例，并且根据它们的深度与敏锐性，我们将或多或少地把他认定为一个思想深刻的历史学家。这些都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一部历史著作的真正价值将来自于历史学家已经投入著作中的思想丰富性与完整性；但是，这意味着这些评论与判断都是历史学家自己作出的；它们的价值是衡量历史学家敏锐性的标准；它们的偏见是了解历史学家思维趋向的线

索。它们不是对历史的判断，而是历史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可以说它们无法可依。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吉本冷嘲热讽，对卡莱尔感情用事；他也许有宗教狂热，也许有幽默感。他可能百感交集，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像一个人正常面对生活一样来直面历史，也没有什么原因。历史学家引入一种可以认同、质疑的个人偏见，这不是罪过。历史著作中的罪恶是以这样的方式组织历史的，使人无法辨认其中的偏见，读者与作者一同被关入其实是一种不可靠的循环争论之中。这就把事件从它们的背景中抽取出来了，然后把它们与现在间接对比，之后再伪装说这样做，“事实”会“自己澄清”[‘speak for themselves’]。也就是把历史设想成这样，或者不论有多细致的历史研究或无论历史概观有多大范围，都能给予我们价值判断——就是假定仅仅通过时间流逝就可以证明这种理想或那个人一直是错误的。

衡量他的研究成果时，历史学家的最后定论也许是对潜藏在时间进程中的一个时代进步原则所进行的某种评论，或者是对辉格党已经为我们发展作出贡献的某种估计，或者是对马丁·路德的宗教天赋的一种赏析。但是，这绝不能与辉格党选择事实的方式及根据一个令人质疑的原则组织历史叙述的方式混为一谈。这些结论将与根据辉格党历史学家的经验法则解决所有问题得出的那些结论完全不同。由于这些结论都不得不通过漫长的研究而得出，所以它们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六 历史上的道德判断

辉格党历史学家的思维习惯以及他对历史的态度自然导致了他对传播道德判断感兴趣，并且把这当作他职责内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这不一定是他实际所用方法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记住他不仅仅把自己看成一个调查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的成见。通过把终结性与决定性赐予给现在，他就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对他来说，后代的声音就是上帝之声，而历史学家就是后代的代言人。他的特点是，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法官，而凭他的方法及才能他只配作侦探。实际上，他对道德领域的关注形成了他渴望作出价值判断、并把它们作为裁定历史中最极端的内容。举一个观念移情的古怪例子，像多数人一样，他开始把法庭所必须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由于实际原因这些法庭在社会上必须拥有的终结性，与所有思维形式中最无用最无效的东西混为一谈——即在回顾过去时对人或行为实施道德判断。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引出自我夸大第一次行为的同一种思维与性格很快又引出另外一种不唐突、不确定、不公开的思维。首先赢得了永世司法特权的武断，现在接着通过一种

相同的逻辑发展成一种更为微妙的侵入形式；因为辉格党历史学家们已显示出这样一种倾向，即通过抓住某种意见上的分歧或政策上的某种冲突，然后声称这是个道德问题，以此来突出他们历史叙述的特色。的确，我们任何人都需要具备很强的自律来拒绝这种倾向。必须记住，辉格党人非常急于谴责过去的一些事情，而且他的一些观点可以自动转成一种类似道德准则的东西。他进行谴责这一真正重担，至少有机会可能落在只强烈谴责辉格党人的事情上。他已经显出不情愿看到从历史中除去道德判断，这绝不是偶然。

可以正确地说，就阿克顿男爵而言，辉格党历史学家意识在他身上表现得最强；同时，可以正确地说，这不仅仅是个偶然，在他的著作中道德判断显得最为犀利也最不妥协，而他对问题的总体评价中，历史的道德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夸大。人们可以从他这方面的说法总结出，他把自己这方面的想法看成是他信奉天主教的结果；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质疑他的自我分析，因为无论是他道德准则的实际内容（因为这能从所谓他的法庭决定推断出），还是他将他的原则运用到考虑中的任何事件的特殊方式，都很难明白二者可以被认为代表着一种明确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体系。如果说应该把这些归因于他作为一名辉格党历史学家的偏见，这样说并不恶毒。他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说“权力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他一直在说的也许是最智慧的真理，但我们可以猜测，这个真理对他思想中的自由派心灵要比对罗马天主教的精神更加珍贵；尽管这一观点可能既可以用来给一个历史人物找借口，也同样可以用来对他进行解释或谴责，但这样的说法是带着一种恶意的暗讽提出的，是作为解释为何

不能体谅身居高职的人的理由给出的。在谈及他的理论真正详细解释的一种历史观点时，阿克顿隐含着赞成态度：“它认为将历史的过去神圣化要比无知或否认更加危险，因为这将永久延续邪恶的主导，认可错误的统治地位。”尽管不是不能理解，但奇怪的是，一位教授竟然认为有必要警告年轻的历史学家们不要过分同情，也不要过分欣赏历史的过去；但更有趣的是彻底的辉格党偏见，这种偏见在这句话中尽管不易让人察觉，但却很明确。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去探求辉格党历史学家思想中对以下话语隐含意思的理解：“罪恶的主导……错误的统治地位”，尤其在由于提及“将过去神圣化”而使这些话语的含义发生变化时，更应该去探求。最后，在这个观点以及阿克顿的许多其他观点当中，我们似乎发现了辉格党历史学家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有这样的暗示，即尽管有对过去种种事情进行道德判断这样的欲望，但历史学家最关心的实际上是现在的某些事情。阿克顿的另外一句话非常有趣，可能也比较尖锐；其大意是，更多的邪恶是因为有意识的罪恶而不是无意识的错误，多数人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它可能有各种价值，但它很少能被看成是历史一课，因为这是一个只有通过自我分析才能达到一种真理的极端例子。联系到另外一句话，它就变得极为危险了；因为阿克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阐明了为什么假定存在罪恶是上策，我们大海捞针似地去找其它解释为下策。他写道：“斯塔尔夫人 [Madame de Stael] 有句名言说：‘我们会原谅我们真正理解的任何事情。’这句悖论后来由她的后裔布罗伊公爵 [Duc de Broglie] 作了明智的修改：‘注意不要过多地解释，以防我们最终过多地寻找借口。’”一种辉格党式的历史理论

又一次在限制理解历史的努力方面取得了实际效果。一个未被定义的领域留给了历史学家作出主观决定，在这方面他将选择不作解释，而仅仅宣布存在着罪恶。人们只能感到，假如一个历史学家拥有这样综合而成的理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一定存在着他强烈想要谴责的某些事情。事实上，这句话流露出太多的热望：“不要让任何人、任何运动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进行的永世惩罚。”辉格党历史学家象阿奎那一样——假如真是阿奎那就好了——可能会琢磨出某种形式来折磨入地狱的灵魂，从中得到莫大慰藉。

但是，在阿克顿男爵对道德判断的观点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论点，忽视了这一事实对阿克顿男爵是不公正的。阿克顿对历史的道德功能持有一个相当吸引人的理论。这也许是抬高历史研究的辉格党倾向的最高形式了。阿克顿给克赖顿主教 [Bishop Creighton] 写信说，当历史学家在道德原则问题上作出一个妥协时，历史就不再是一个“争论的裁决人，不再是尘世和宗教势力本身始终倾向压制的那种道德标准的拥护者。”历史在以不正当手段干预道德准则时，“它本应该主导的时候它却在提供服务。”这种抬高历史的做法确实很吸引人，因为这样就赋予它权力分合，有权成为争论的裁决人，有权主导而不是服务；但人们可以相信，这个理论采取了一个过短的捷径来达到绝对。这种历史像黑格尔政权一样侵入，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在道德世界中取得决定性地位，掌管着“宗教本身始终倾向于压制的”那种道德标准。这种历史被抬举为上帝之旨之类的内容，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事物进行最终判断。这是真正的教皇，他不会成为众仆之仆 [*servus servorum Dei*]；这是辉格党人想辩护的唯一绝对主义；

这是神圣的权利以及不抵抗，因为（如果能恶意地说句话的话）难道历史不是站在辉格党人一边吗？要拒绝将历史个性化、理想化这个诱惑并不容易，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浪漫化对历史学家的态度有影响。结合其实际后果来讲，这意味着抬高历史学家的观点。在认为历史是裁决人，历史有资格判断，尤其有资格判断道德问题之时，这种方法达到了最高点。阿克顿男爵将它推到了逻辑结论的终极。“历史科学的职责就是维持道德作为判断人物及事件的唯一公正标准。”“要发展、完善以及加强良心是历史的伟大贡献。”

但是，阿克顿并没有针对那些信仰不同的人真正为历史学家的道德职责辩护。他关心的却是，应该怎样阐释这一职责，并且关心应该如何严肃地执行这项义务。他攻击这样的历史学家：在他想当然地把道德判断作为自己职责的部分内容时，却利用自己的特权轻易进行免除，随便处理道德准则。他的主要道义是对历史学家引证的不严谨的借口进行令人信服的抗议，尤其是当这些借口被机械地用于任一特定情况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即一个历史学家的解释——比如谈到一个人的修养或者“时代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age’] ——如何能真正免除一个有罪者，例如，公元15世纪的一个教皇。当用尽了所有历史解释方法来解释人物与行为之后，必须记住，真正的道德问题仍有待解决；还有，历史学家怎样解决那些蕴藏一个人最终道德责任的人性隐秘处？阿克顿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仅仅说，有疑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严厉些。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即更多的邪恶是由于有意识的罪恶造成的，而不是由无意识的错误造成，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注意不要过

多地解释，以防我们最终过多寻找借口。”假设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了道德问题，并且已经接受了提出问题后必然隐含的假设，他就一定不能从这个崇高的道德境界滑落下来坠入自己定义的历史世界中，接着再放松要求形成完全不同的一套假设。尤其是，在他已经给出其实只是对人物或行为作出的历史解释时，他绝对不能设想他这样做就已经作了一些解释并消除了道德责任。阿克顿正确地指出历史上道德判断的问题核心所在；由于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感到不满意；关键时候，他只能告诉我们要严厉些。因此，他在这一特殊问题上的态度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基本论点而牵扯进来的：“最好对死人不公正，也不要将一些有关道德问题的不严谨观点四处传播。”这实际上就是历史上道德判断的归谬法 [*reductio ad absurdum*]。阿克顿通过关注这些道德判断的真正问题，几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对拥有这些道德判断的论点。面对他种种理论为我们提出的无法解决的困境以及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们唯一的退路就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事实，即历史与历史学家所能做的有限。因为他们关心的正是对人物与行为的历史解释，而且假如我们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或者打击，正如甚至阿克顿似乎倾向做的那样，我们正在危险地接近这个论点：“宁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要做任何可能降低历史道德尊严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历史解释没有谴责；也没有寻找借口；甚至都不涉及这类话语产生意义或相关性的领域；它由根据具体世界中的事件所作出的各种观察所组成；它不多不少，正是在事件本身背景中观察的过程。的确，历史学家没有权利去免除什么；但他也没有权利去谴责什么。假如他不否认存在一些可原谅的罪恶而能够原谅所有罪恶，那么

他的头脑就会大大清醒；但记住有罪这个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历史问题。尽管宣称不存在道德责任确实不是他能力所及，但我们可以说，这种责任超出了历史学家作出历史思考的特别领域。假如他努力想涉足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他会面对各种不可逾越的困难。

假设——内容可能要比表面上看更加困难——在道德观点上达到一个共识的话，要发现这些观点对任何一个特定实例的影响方式，是件微妙的事情。必须记住，道德判断本身实质上就是绝对的；因为除非人们可以确定地宣称这些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作出判断就毫无意义。20 世纪的道德家讨论迫害的道德法则，说也许宗教迫害在今天是错误的，说也许在所有时代都是错误的，这些可能都是容易做到的。判断事物、谴责行为可能比较容易，但历史学家如何推广到对人们进行谴责，运用他的各种标准来判断具体时间的一个具体事件？要他说因为那个时代认为迫害是自然的，并视之为义务，所以 16 世纪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赦免？还是要他因为人们思想不够创新、没有超越他们时代的规定与标准而谴责他们？要他谴责玛丽·都铎 [Mary Tudor] 是个迫害者，赞美卡特琳·德梅迪西追求宗教信仰自由，还是更准确地说，玛丽对天主教非常狂热、始终如一，而说卡特琳更世俗、更冷漠？历史学家的职责首先就是描述英国女王造成的各种迫害，叙述法国女王企图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所作出的努力；但是，不能因为他筛选资料、权衡证据有一套艺术就意味着他有才能决定实施道德责备或嘉奖。假如由于任一道德判断他阻止了富有想象力的勤奋工作，假如他通过道德指责阻挠理解历史的努力，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面对亚历山

大六世 [Alexander VI] 被指责的毒害事件，历史学家的职责应该仅仅是对此发生兴趣，仅仅对这类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好奇。他的义务是，证明为什么玛丽进行迫害，为什么卡特琳却不愿这样做，直到我们自然地认识到一个人居然这样做而另一个人做法不同为止。也许相应地，在他致力于证明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事件以及一件事情是怎样做完的时候，实际上他解除了我们的道德判断，并且终止了要作出道德指责这一念头。通过致力于解释玛丽·都铎如何发展到后来的过程，他暂时使道德判断变得完全不相关。事实上，历史学家的艺术是描述性的，并不进入道德观念这一领域。他的材料、他的过程以及他的所有装置都为他能证明一个特定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存在。如果他跳出自己真正的职责范围，仅仅对我们宣布这件事根本不应该发生，那他是什么人？

实施道德判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复杂情况，从波拿巴·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的例子得到了解释。拿破仑宣称，由于他的天才及命运，他与道德世界隔离。他认为自己超越一般的是非规定，并且似乎一直认为自己是落入人间的一个不凡之胎，一个完全不能用道德标准看待的人，凭着自然界看不见的势力毫不在乎地生存着——有点像突然降临世界的一场雪崩。的确，他对别人的道德并不是漠不关心。他的职业简直就是重建一种大革命 [Revolution] 期间瓦解的道德秩序，重新约束社会，恢复生活的行为准则。但这与他宣称的超越道德秩序是一致的，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道德目标，就象黑格尔政权宣称的那样。他相信，只有其他人为他服务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为自己利益所做的一切，他都可以认为是为法国的辉煌而为。所有危及他地位的东西

都是对国家的一种威胁。他的情况、他的权利及他的本能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不能用道德标准看待的人。

当一个人已经彻底宣称自己超越道德秩序，历史学家除了描述他对自己的看法之外再做其他工作就成为多余的了。一个人不承认道德秩序或者认为自己超然于道德法律之外，那么讨论他的道德感，就成为多余或者十分微妙的事情了。当一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声明了自己的整个立场，要讨论他的任何一件具体事件是否一定就是不道德的，就没有太大的用处。假如他宣称超越道德秩序，研究他的错误就会更加有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说自己就是国家时，最重要的是他不应该犯错误。假如处死英格恩公爵 [Duc d' Enghien] 对维护拿破仑政府非常必要，人们可以说这对法国的稳定与和平非常必要；在这件事上，就提出了人们可能做些什么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一复杂问题。但是，假如拿破仑犯了错，假如那个处决对维护拿破仑政府没有必要，那么这个错误本身就是不道德行为，要说这个错误比一个罪行还可怕，就不仅仅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

但是，除非可以用道德判断来暗示两人之间的一种比较，否则道德判断就没有用处。要不然，历史学家就只能陷入陈词滥调，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犯罪的时候。同时，除非我们还比较一下人类自身的处境——他们处境的紧迫性，他们工作的意图，他们在要求别人的同时情愿对自己作出的要求——否则就不可能做这种比较。要判断拿破仑这样的人，又一次证明比较困难，因为可以说，他站在自由空气中，有权利我行我素。没有政府控制他的行为；没有法律或警察管制他；没有立法机构对他的道德表现进行约束；没有对社会舆论的

恐惧阻止他。所有这些约束我们大家自私行为的力量以及所有那些甚至限制我们欲望的环境，可以说都与他无关，结果他就成了自由人，无拘无束。一个人的处境与权力使他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自由自在地随意处置其他人，这种情况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假如普鲁士国王有权力实现各种抱负、有机会自由发挥想象的话，我们不知道他的抱负是否会更加节制。我们的实际情况使得我们的欲望很小，而且有上千个欲望得到自动压抑，假如我们有能力涉猎整个欲望世界，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比普鲁士国王生活得还要体面。我们的确知道，尽管这个人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不受约束，但他一生当中还是有出色的自律。这不是为拿破仑辩护，因为拿破仑知道他的事业是对整个大陆的一种灾难。这些事情并没有消除阿克顿男爵所重视的道德责任。但是，这些的确证明拿破仑对历史学家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绝对的道德判断的对象。这些让我们有必要把整个问题转换成历史学家有能力处理的术语。假如我们说，拿破仑的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描述对象，我们就进入了历史学家自己的世界。

历史学家的职能不是随意看待以下问题：有关道德责任的所属问题；有关在什么程度上结果说明手段的正当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好的理由掩盖邪恶行为的问题；或者有关一个人在多少程度上可以采用马基雅弗利主义 [Machiavelianism] 或许来拯救一个国家的存在问题。但是，他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拿破仑曾经撒过谎，可以证明亚历山大六世毒害过人民，以及玛丽·都铎进行过宗教迫害；说一个人是懦夫，另一个人是狂热者，或者说一个人嗜酒如命，这些也许与其他任何历史归纳一样正确。描述一个人的特征，分析某一思想及个性，

都受到明显限制，都只是整个历史阐释领域的部分内容；因为历史研究假定说，通过同情、洞察、以及想象力，我们至少可以增加些对他人以及其他时代的理解。另外，历史学家可能会关心曾经困扰阿克顿男爵的问题：传播有关道德问题的不严谨观点可能在任何时候已经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在考察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不择手段地实现目的这种教义在过去特定时期内所带来的那些后果时，或者在他证明与国家相关的各种伦理理论的历史重要性时，历史学家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领域。当阿克顿断言说：“圣约翰 [St. John] 与维多利亚时代之间伦理学方面的进步”几乎没有的时候，他也许是对的或错的，但他正提供一个我们可能称作历史陈述的东西。伦理问题只有在它们属于历史学家不得不描述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内容时，才与历史学家有关；他关心的是伦理准则与理想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只要道德是历史的一部分他才与它打交道。假如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可能会要求历史学家描述道德的发展。假如道德是一个绝对范畴，随时随地都以相同的力度来约束，那么它与历史学家无关，因为历史学家的机构只允许他考察变化事物的变化。但即便这样，要求重新陈述的也只是问题的形式；现在他将不得不观察人们不断增强的道德秩序意识的历史，或者观察他们是怎样逐渐发现道德秩序的。即使道德感是绝对的，对他来说并不绝对。

考虑到几个世纪以来的概括性历史，有可能观察到宪法政府与宗教自由的演变，而且人们可以把这种演变视为所有人类合作的成果，其中辉格党与托利党不由自主地提供了协助，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两者对这个进程都很必要，秩序原则

与自由原则永久相互作用，以及重要争论双方面的争斗，一方被时代认为是正确的，另一方是在历史学家看来无论如何“他们在私生活方面无可挑剔”。但是，假如历史学家准备去区分意愿良好的人们为之相互争斗的各种意图，假如他准备把问题看作一个道德问题，并把它变成一个绝对判断的重要问题，假如他坚持说他的任务就是把他的研究对象放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去研究，那他肯定会找到更短的捷径来实现他正在努力的任何目标，由此他的历史会书写得更加有力，因为这将是辉格党过度戏剧化的一种形式。他也许会把自由与宪法政府当成善恶原则永久交锋中的问题。他也许会把古老的争论包揽过来，永久地分离人性，并利用现在来判断过去，将所有时代永远分离。事实上，他已经能够承认重要争端的双方都有好人，但他这样做的时候不能牺牲任何必须被看作是道德谴责的奢侈与令人愉悦的快感。在一切背后，尽管有一种类似善恶交锋的宏伟方案，辉格党历史学家已经发现有可能把最后一种古怪的巧妙方法留给自己。他甚至可以选择原谅福克斯的私生活，不去对“皮特的压抑政策”进行道德谴责。因为，说到阿克顿男爵，我们被告知“他几乎没有欲望要打听国王与政客的私生活道德”，正是阿克顿告诉历史学家们说，他们必须“怀疑权利胜过怀疑罪恶”。辉格党人似乎更喜欢将他的道德立场建立在他命名为公众政策的更大问题上。因此，在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上，我们已经强加了这个特殊历史学家的伦理准则，根据这些准则我们可以忽略一个国王是个浪费者、是个浪子这一事实，但假如有个国王过高颂扬自己的职位，我们的道德情感就不能容忍。伯克 [Burke] 有句名言得到阿克顿的赞同，即“真正政治的原则

是道德经过放大的那些原则”，这句名言可能非常有道理，但到了历史学家手里可能会不安全。它的种种危险丝毫不在于它能如此轻易被颠倒这一事实。

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符合历史事实的世界之图。他向我们描述了潜藏在各种变化事情的变化下面的整个过程。他把这个当作他的解释、当作他对我们了解自我以及人类事物的一种特殊贡献。它代表他的特殊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其自己的规则，并受限于他的机制。假如他扬善惩恶，假如他谈论“罪恶的主导，错误的统治地位”，他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绘画角度，因为他绘画的根据实际上来自另外一个领域的尺寸设计。假如他要涉及道德判断的话，他就在企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空间，他就偏离了历史性解释的那个领域，这正是他唯一可以称之为自己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这样说，他的义务是证明人为什么会不同，而不是讲述一个旨在揭示谁是谁非的故事。必须记住，仅仅通过调查与解释，他正在增强人性理解，正将它扩展到所有时代，正把世界联为一体。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而不是在“完善与加强良心”的工作上，探求历史成果、历史功能以及历史辩护。

最后，针对阿克顿认为历史是争论的裁决人、是她所有考察内容的君主这一观点，可以说历史就是上帝仆人的仆人，所有苦功中的苦功。历史学家为经济学家、政客、外交官、音乐家提供服务；同时也为谋略家、神职人员及行政人员服务。他必须从所有这一切学到很多东西，才能真正开展解释历史的工作；他从没有权利对任何一种人发号施令。他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他处于一个需要提供证据的地位；即便如此，他也有可能滥用职权，而且他需要最仔细的盘诘，

因为他是其中一个“专业证人”，这些证人坚持要提供隐藏在他们证据中的见解。也许所有历史书籍对那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危险。无论怎样，要忘记真正构成历史研究基础的真理，永远是危险的：即所有历史都是永远需要通过更多的历史来修改的真理。一切都说明白之后，假如我们还没有理解，那么所有时代的历史可能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因为它可能仅仅为我们提供一块更大的油画布用来胡乱涂抹，为我们的固执己见提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不同的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她同时为好坏事业服务。也就是说，她既是娼妇又是佣工，因此她为那些最怀疑她的人服务得最好。所以，甚至我们这样说也必须多加小心，“历史说……”或者“历史证明……”好像她自己就是圣贤似的；好像历史一发言事情真的就不容人类置疑似的。相反，我们必须对自己说：“历史到最后盘问结束之前都会撒谎。”当辉格党人声称让历史当争论的裁决人时，这就是他所崇拜的女神。她用一些视觉幻觉、一些花招以及模棱两可的措辞欺骗我们。假如我们必须通过将历史人格化来混淆忠告的话，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一个老恶棍来对待，并且要提防着她那些把戏和花招。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准备到市场来交易的成包成捆的东西。理解过去并不像有时它被描述得那样简单。

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学术界有教师像我现在这样高兴、自豪地讲起他的前辈一定很少见；而且，至少这次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也有同感，因为剑桥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喜欢听到对这位前辈的赞誉胜过喜欢听到对这一领域任何其他人的赞誉。

历史研究最吸引人的章节之一是马比伦 [Mabillon] 的作品。他在历史学的根基动摇之时向世界证明了有关过去的一些事情是可以多么有把握地确立的。马比伦是本笃会 [the Benedictine order] 成员之一，而且在献身历史的研究者中，他属于少见的众人都会自然称之为“杰出的”才智者。在论战中被他打败的诡辩家对手为他倾倒。这点总让我想起诺尔斯 [Knowles] 教授在剑桥的升迁以及他受到修道士之首库尔顿 [G. G. Coulton] 欢迎的动人之景。现代史学 [modern historiography] 大大得益于本笃会学术传统，而为发扬该传统付出大量劳动的戴维·诺尔斯，将作为宣扬该传统最佳者之一流芳千古。

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撰写了充满生命力的杰作，不仅赢得学者们的倾慕，而且受到全世界广大

读者的青睐。他的书籍见证了他那坚定信念，他虽然有点沉默寡言——但在令人同情的沉默中——他矮小结实的身躯却蕴藏着几乎是世上最坚强的意志。他并不是我系教师教出来的，但却在大学时期致力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研究可谓传承古典传统——句句稳健朴素，清晰肯定。不过，他将因给我们这个本来仅有区区技术成就的职业贡献良多而流芳百世：他思想开放，善解人意，深谙人事，善于发现瞬间的柔情和美丽。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用丰厚的内心生活来解释人类史上宏伟不朽的事件之一。他提醒研究历史的学生说，教会及其各种机构体系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宗教处理，因为他们心中装的是历史中稍纵即逝的东西：虔诚者的精神生活。隐修规章，甚至神秘主义及思想史都在他的各种杰出研究中得以阐明。作为历史学家，他不仅博学多识，而且洞悉无遗。再者，他始终是我们的杰出教师之一，所以我首先要向他表示众多受其启发的那些人对他的感激之情。

探究历史研究现状的尝试是个大工程，比过去越发难以可行，不过它也许仍有召集智者的作用。当然，其中一些有助于决定近代发展过程的因素还是清楚的，其重要性也在近半个世纪来显而易见。其中之一就是战争，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从1919年开始就相当惊人。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对这一学科的兴趣——这既有危险也有优点。还有一个因素是，历史在大学里乃至世界上越来越盛行。坦珀利 [Temperley] 教授曾在1930年他的首讲中对此影响的后果表示过担心。^[1] 其他因素有：这门学科内的职业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已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自然科学系统及其各种方法对我们称为文科学科——对人文学科总体已产生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范围当然没有缩小。如果我们已有某一税种运作或者某家庭房地产方面的各种专著，在特定时间内，思想史亦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单个历史学家兴趣的有效范围似乎在严重缩小。这意味着这门学科的各种分支分隔得越来越远，比如，思想史就倾向于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近年来关于我们称作“历史解释”的学科已有很多的著述；但是，尽管这是理论探究的一面，有人可能认为它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最为接近，但实际上它还没有对我们的研究分支产生影响，而且一直是留给哲学家研究的。哲学家有时缺乏那种来自于真正研究实践的知识，或者缺乏丰富的具体实例，使他们难以在需要阐释观点时拿出恰如其分的例证来。

尽管自然科学家之间可能同样存在许多盲区，但他们有时会对历史和科学哲学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剑桥，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拓宽了其研究领域，甚至拓宽了他们对自己学科的想法，进入我们认为属于人文学科的领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或许是我们整座大学思想最活跃的地方；而且，在更近些的时候，是科学家首先给他们的学生设立了文科课程，然后又让我们感到有必要针对文科学生开设一些科普讲座。如此众多的剑桥科学家把剑桥史与此特性结合起来，本来会让我们在自然科学史上占据领先地位。但近年来，虽然这门学科在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但它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却一直

让那些对全局感兴趣的人不安。这门学科受到系与系、部门与部门之间刻板隔阂的一些损害，这些隔阂同时也阻碍了俄国史在英国大学里的发展。不过，这门学科在方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正作为一门独立职业出现——在此职业中，甚至连前科学家现在有时也取得了高度的历史训练。在学术性更强的层面，我们正期盼《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的评论版会很快出现，它将综合国际学术界与思想界最有特色的因素，^[2]把现有的大量研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工作推向一个高潮。在分析性更强的层面，正是在英国，在牛津，1961年举办了以“科学的变化”为主题的规模庞大的研讨会，其重要性在于打开了多少窗口，而不在于实际回答了多少问题，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提出的最伟大的议题，即科学发现的问题——其条件及涉及的过程。^[3]由于总体上与历史分离，该职业领域与学科各层次仍蒙受损失。即使在前科学家已获得关键方法以及我们应称作历史感的方面，他也并不一定了解这门学科的潜力、那些可从历史证据中得出的内容以及那些可以用历史解决的问题。而我们自己也可能因这种分离而蒙受损失——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损失，因为我们无法衡量它，甚至无法对它产生意识。由于科学在近几个世纪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文化中的这一方面在任何通史的合成中都占有很高的地位。

谈及我们称作史学史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的东西，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它影响我们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敏感性与意识。这一学科在许多地方已激发了本科生的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外部了解他们的课程，并使他们免受历史教育最致命的危险。除非碰到像个人性格或知识结构坚不可摧这样的

特殊情况，否则这门学科可能给研究生带来极大风险，如果他打算上下求索一段时间，首先就应当在具体的历史事件范围内，以获取发现过程的第一手经验开始。但不论如何，这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有时还被视为思想史或文学史（包括讨论历史思想或历史作家的观点）的一部分，但更近些时候，它还得到技术性更强的处理，俨然是科学史的一部分，探究的是学术研究分支的演变。如果有人问，知识的极限目前位于何处，先驱的成果可能在何处产生最大的转移——我认为，激动人心的下一步应当是对方法本身的定位研究，一部更全面的历史批评史，因为各处的偶尔发现已经证实，这个主题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而且，其方法问题在我们的各种史学史中最受忽视。还有更重要的是——特别是近年来——有必要拓宽整个学科框架，因为我们认识到，大规模研究人类与其历史之间的种种关系需要许多不同学科的参与。人对过去产生意识，对时间过程不断变化的态度，以及纪念过去的种种方式——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参与到人类意识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这一层次，把史学史与科学史的范围延伸到其他领域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与过去相比，这正以一种与我们更为相关的方式得到实现，由此，它甚至将影响到我们书写西方的方式。

在东方与非洲学系的支持下撰写的亚洲史著作以及李约瑟 [Needham] 博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已使我们更接近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能产生真正对话的那一刻。如果想象一下整个世界史，它的两大主题——深深切入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其一是，历史写作一开始就遇到的各种悖论以及令人惊奇之事，其二是，为什么古代中国的历史思维方

式——的确，也许还有科技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如此不同。目前对上述某些领域的整体学术研究仍然支离破碎，但却十分活跃。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应当知道它们的存在。

近几十年来，在历史研究方面发生了制衡变化，兴趣分布上的变化；除此以外，还有近代史研究的大发展。各国政府通过他们的官方史和公布的文件，已极大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假如各所大学曾打算把它们的课程限定到更遥远的过去时段，它们也会受到外界各种力量的压制。学者们已可以使用大量资料，鸿篇巨制也已出版。最近新出版的研究史学的一本书已经强调了一部严肃认真的当代史有多么重要，原因是，在第一代之后，时间的流逝既导致严重损失，也带来许多得益；因此，即使在某些方面知识的确不断进展，也易产生一种史学的倒退。^[4]不管怎样，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如今授给近代史的学术地位。

然而，由于五十年条例 [the Fifty Year Rule] 的运作，在撰写历史时，学者们被迫不能使用那些重要文件，而这些文件对整理好其他所有证据十分必要。以古奇 [Gooch] 与坦珀利的著作涵盖的早期年代为例，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尽管已公开的文件很有价值，开放文件档案本身却导致完全不同性质的工作。但就在我讲演的此刻，连 1914 年 7 月危机的档案还未开放以供研究者自由使用。

这关系到我们整个职业，甚至我们当中不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人也会因为发现一门重要的研究分支的真正基础居然被如此剥夺而深感不安。我们甚至无法估算有多少研究生因为文件的保密或文件不可靠而一直无法听懂教师教授的专业内

容。海外留学生本打算来剑桥接受培训，但却去了别处，因为他们在其他英联邦国家可以查阅一些时期的文件，而在伦敦他们却无权查阅。有时，面对可以更自由查阅档案的其他国家对大不列颠的指控，连我们自己的作家试图反驳时也遇到障碍。人们曾希望通过得到特许而缓解这种情况，甚至是在档案的保密期内，但这样的特许取决于政府部门的决策。然而有关部门从未做出这样的特许以应对这种情况。即使引荐一些史学家给相关部门提建议，或者让他们参与给予或拒绝给予这些特许的过程，如果档案的保密期限是五十年之久他的话，他们往往会陷入遭人忌恨的处境。

过去常有辩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公务员需要保护——要是他们面临过早解密档案带来的危险，他们就无法自由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想一想公务员必须等到多大年纪他的档案才能对历史学家非常有用，上述观点就几乎无法成为将文件保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理由。问题在于政客们，我们其他所有各行各业的人都得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政客们居然如此敏感，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看法是，我们尚未学会对政客们表示半点同情，而我始终与我同事们的那些人不一样，他们似乎认为政府存在仅仅是为了让史学家能够在今后为他们著书立传。时光的流逝已给当今世界带来比过去大得多的变化，只要三十年就会把我们带回希特勒政权的发端——这段时期甚至对那些对此记忆犹新的人来说都十分古老。如果有会因为解密档案而带来严重后果的特殊情况，这个难题总是可以通过特殊措施来解决，比如有时甚至有必要受五十年条例的限制。想到三十或四十年后会公布一名大臣的行为或建议而给他以限制，就把这种限制太当回事了；因为世界很

快会把过去抛之脑后，而且无论如何，世界上充斥着无数往往比事实更加耸人听闻的“曝光”。考虑到现代民主的主张和社会前进的方式，即使按照目前情况，一名政客把今天算在三十多年的保密期内是否理智，这一点令人怀疑。

尽管具备迅捷的通讯设备以及现代国际机构，史学仍具有国别色彩；即使是关系密切的同盟国的学者们，有时也会碰到永远无法逾越的思想障碍。我们职业的机构、富有想象理解力范围的局限、把精力集中在本国档案的倾向、甚至还有对近代史的强调，正是在这点上派别偏见更难克服——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保存那种狭隘思想，当对方思想狭隘时我们总是更容易地发现，而且这种狭隘对历史本质的影响要比对自然科学家的影响更为恶劣。国际历史学家联合会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 并不是对付这种狭隘的良方，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家主义原则在其组织机构中、或至少在其基层起重大作用；而且，肯定总是存在它变成一个实为政治斗争舞台的危险。它的一些附属团体的杰出表现（因关注某个确定主题和方法其成员更密切地合作）可能暗示其发展方向，假如我们意识到要改革我们行业的各种国际机构的话；我们或许还可以更仔细地观察自然科学家中相应的团体。如果像我听到的那样，沙博德 [Chabod] 教授确实一直在考虑改革联合会主体，那么我们因为他在即将就任斯德哥尔摩大会主席之前不久去世而哀悼他就又多了一个理由。

然而，那种狭隘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导致国家主义的偏见，而且导致尤其不易自察的更普遍智力局限。最严重的时候，它使——从全局上使——假设与预感从中神秘涌现的

思想背景严重匮乏。就本科生的学习而言，所有国家在呈现历史时应当更进一步，不仅仅涉及国际内容，而且应习惯性地、正常地包括多国或国际的学术成就。要做到这点困难重重，因为可以说，越与本国相关，我们对历史的兴趣就越高，毕竟每个人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国家。然而，正因如此，在中学六年级与大学的教育分工上，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科学化，比我们现在还要科学化。还有一种情况也存在，人们转而研究欧洲以求更开阔的视野——比如，可以研究拿破仑——结果却比以前还狭隘，如果他的阅读仅仅限于英国作家的话，尤其如此。即使课程设置扩展到中国或印度，大学的惯例仍可能使学生回避那种本会使扩大了的课程变成全新体验的东西。的确，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可能会回避上述这些国家会造成的真正的智力挑战。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充分重视会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大陆之间的相互得益的交流。尽管我们似乎有特殊的理由来保持思想狭隘，但除了英国，再找不到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即便是本国的历史也没有理由孤立研究。我们并非总是认识到我们从大陆不断吸收新的内容。

都铎王朝早期，主要是波利多尔·弗吉尔 [Polydore Vergil] 的英国史给我们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积极影响，尽管该书对某些传奇的冷漠态度使该书不受沙文主义者的欢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甚至是爱德华·科克爵士那臭名昭著的思想狭隘，这种狭隘似乎特别具有英国特性，其形式与特色也可能是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因为，尽管人们可能没料到，几十年前就有一些法国人，他们对其宪法与历史权力发表了惊人相似的言论。不过，是亨利·斯佩尔曼爵士 [Henry

Spelman] 通过研究欧洲其他国家、建立与欧洲研究界的联系才在十七世纪提出了其中一种对英国历史进行伟大修订的初步看法。

那个世纪末，众人不断抱怨说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古老的 国家”居然没有一本像样的历史。有人建议说，这项工作可能通过合作来完成。有人想到，从最好的断代史作家的文章中摘选一些段落然后串起来。詹姆斯·蒂雷尔爵士 [James Tyrell] 在 1700 年编撰编年史时，希望他的著作为未来一部像样的历史铺平道路。在这一重要的转折时期，是雷宾 [Rapin]，一个法国新教徒，给法国人撰写了一本大部头的英国史，该书在英国一直用到休谟 [David Hume] 出现，并且在休谟之后仍保持其重要地位，因为休谟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5]。同一时期，德国人自己的历史写作也依赖于一个叫巴雷 [Barre] 的法国作家^[6]，尽管在十八世纪末之前，是德国人对瑞典及俄国的历史起到了促进作用^[7]。

除了德国在十九世纪给英国宪法历史的发展施加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之外，外国学者的著作在另一个多产时期，19 世纪 90 年代，变得重要起来。譬如，冯·鲁威亚 [von Ruville] 因为是德国人，出了一些有关英国史的错误，但也提供了新的发现，由此我们对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现代看法要起源于他对纽卡斯尔文稿 [Newcastle Papers] 的创始研究。再后来，我们还知道维诺格拉多夫 [Vinogradoff] 在他撰写的《英国隶农》[*Villeinage in England*] 一书的序言中解释说，他在俄国的亲身经历让他澄清了当时在英国正以一种过分依赖古物研究的方式处理的问题。戴维·奥格 [David Ogg] 描述过，同样一个学者如何在他的讨论课上，通过他所掌握的斯堪的

纳维亚、斯拉夫及日耳曼习俗的知识，完全改变了对布雷克顿 [Bracton] 的正确评价。^[8] 还有一例可以证明维诺格拉多夫的重要性，因为在 1884 年 5 月 11 日，他仰卧在牛津的庭园里，让梅特兰 [Maitland] 转而研究法律史，而且让梅特兰激动得在第二天平生第一次去了伦敦档案局 [Record Office]。^[9] 内米尔 [Namier] 的一些深奥思想极有可能是因为他研究我国历史时不带有英国人的任何偏见。

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或许它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的预感、洞察力及灵感来自何处？这使人想起似乎出现在自然科学各种分支之间的相互得益的交流。通过全方位考察英国史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或了解外国学者的观点、或发现别国对待历史的方式之后，我们仍未获得所有一切本可获得的东西。而且，大规模修订英国史往往必然相当于打破狭隘——打破我们自我封闭地看待本国历史的习惯。这一点的确具有另一层含义；因为它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不会充分理解让英国学者研究西班牙史的重要性——该学者本人决非仅仅是西班牙教学传统的产物；或者在意大利史方面有一个英国人的权威，他不会特别重视与意大利人保持一致，甚至也不在乎是否能获得他们的赞许。正如美国学者也对英国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样，让一支独立的英国学派来研究美国史这一想法同样重要。

在几乎无限小和几乎无限大的世界之间（科学家们已发现这里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我们应当谢天谢地，存在着一个中界，这里的一切按照牛顿所说的那样发生——这是一片绿洲，人类也可以在此生存并且过上一般还可以的日子。

政治史交到我们手上时，本身属于可称作普通人相互作用的类似的中间世界，这是个普通事物的世界，经得起常识检验并适应平常对话的语言。这个想法似乎是，努力找回大量历史事实以便我们能像谈论当今政治一样谈论过去。然而，现在我们正移向亚微观的领域，有时单个的原子正顺次受到审查。爱尔兰人在实施一项大规模的任务时，收集了成千上万人对 1916 年的回忆——从每个有所回忆的人那里收集。英国人正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有关曾有过议会席位者的一切收集起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有必要考虑我们政治史的去向；因为尽管有可能对可计数的物质必需品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个程序对涉及更多无法估量因素的领域却不那么适用。有时，传达给我们许多政治史证据的日常语言是否总能承受附加其上的所有科学之重，可能还是个问题。如果说过分强调这种忧虑是错误的话，那么在所用的一些方法中至少有危险——或许在与这些方法相联的思维模式上尤其如此。危险在于，丧失我所说的政治家的眼光——丧失对全局富有想象力的把握，正因为这种眼光把握着尤其无法估量的因素，它才比任何仅仅计算人头数有更重大的意义。被压在罗尼欧蜡纸复印的文件之山下的政治家本人如果丧失了领悟全局的眼光，就会处于类似的境地。

另一种危险在于，使用证据过于拘泥于字面意义。举一个简单到荒谬的例子，意大利外长告诉德国大使说他非常想和德国建立友谊。这样的言词可能出现在友好外交辞令中的任一场合，而且很可能是预示着要与德国人谈不愉快事情的开场白。要是把它定成政策，可以附个脚注加以证实，甚至加句貌似可信的引言；但该引言一旦脱离其语境，意思就发

生改变，而且只要被转写为历史学家的笔记，其地位就会改变。一个本科生由于卷入恶作剧给父母写信要钱，可能永远不会偏离表面上的事实，但会发现用所谓战术意图的东西使其措词带上倾向性是很自然的事。只需父亲的一点儿想当然就足以让他确信其字面意思，结果可能就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在谈判中，在买卖交易中以及辩论中，我们不得不对付这些言辞，而这些言辞经常是“带有倾向性的”，以使得对方按己方的方式做出相应的行动或反应。对证据毫无想象力的解释并不仅是博士论文才有的危险。假如历史学家要弄明白自己最基本的原则，他就每周都必须脱胎换骨。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要求的历史修订的大部分内容会与这些情况有关联：即，对文件语境中微妙的特点未加认真考虑（或没有足够的知识）就认定其表层意思。再者，这种只对字面的理解似乎影响的不仅是对书面证据的使用，而且还影响对历史问题本身的处理。一名君主或政治家，尤其在他刚刚即位后，可能会觉得有必要摸索自己的道路，或先试这个方向再试另一个方向。如果你对船的连续转向处理得过于僵硬——如果你也没能测量风向——你就会让他显得漫无目的，或者总是变换目的，结果他和历史本身都开始变得好像比实际更疯狂。人的头脑——假如你允许他有头脑的话——的确会较为理性地看待人类事务的进程及时间历程；如果不是这样，历史知识将永远派不上用场。

但如果我们研究几乎无限小的领域，我们今天就会像科学家一样，也进入几乎无限大的领域。这种历史已获得全面的发展，它考察整个社会的情况，或多数人群的运动，而不是政府或领军人物的行为。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中心或位于

中心位置的官方档案上——甚至也不仅仅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待发生在全国其他各地的事情——我们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构建一种全景式的历史，一种自身有动力的历史，政府行为显然仅在其边缘发生。^[10]而这一点——也许部分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它发展得较晚——已经促成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给历史学家非讲不可的任何历史故事都增加了新的空间。有时，它几乎消灭了历史叙述，暗示它是对各种情况的一种静态研究；结果是，叙述成分几乎不复存在，人们再也看不到历史变化的本质，这在《新剑桥现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第一卷中尤其如此。所以，目前的各种趋势使政治史的整个地位成了问题。

在这点上，拉布罗斯 [Labrousse] 教授的一个说法值得所有历史学家考虑，特别是因为这个说法出自这位历史统计方面的杰出专家，而且这个说法还代表对他过去观点的修订。除此之外，此说法还得到乔治·勒费布尔 [George Lefebvre] 的赞同。拉布罗斯描述完物价难题与法国 1789、1830 及 1848 年大动荡的密切关系后，从单纯技术领域转到更总体性的调查，并警告说，他的数据不足以解释实际发生的革命。在此背后，也有不同性质的多种因素——个性的冲突、恐惧与激情的作用、意图与相反意图的相互作用，有时还有厄运的干扰。拉布罗斯还暗示，如果 1789 年是个像亨利四世一样的人位居法国王位，而不是路易十六，历史可能会迥然不同。^[11]正是这两套极其不同却并未相互脱离的因素相互交织，使人们对总体变化机制的看法变得异常复杂，同时让我们最后不得不对一段历史采取全局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历史上有些东西只有通过叙述方法才能使它们得到公

正对待。况且，即使我们已决定采取最先的立场，把历史看作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产物，为的是让历史从全景中脱颖而出，最终我们还会认同这个观点：政府的运作、政治革命的发生、甚至核心处发生的种种密谋都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起很大的作用，它们产生的影响有时远非不重要。也许这令人惊奇，从历史学家那里，我们听不到有关历史地理更多的信息，历史学家也没有进一步拓展历史地理知识，而具备这些地理知识将会更深入审查譬如欧洲的政治版图，考察它为何演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百衲被模样——为何在愚昧黑暗时代结束时类似我们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开始出现。我认为，我们应当找到前辈在什么情况下想象出一个原始的法国国家主义及德国国家主义，并将其变成万物之根由，今天我们会把这种国家主义当作结果而不是根由，并将欧洲政治版图的大部分——许多国家的诞生——归因于各王朝与其对手斗争的结果。同样，假如我们以评估欧洲史上君主政体的作用与成就为起点，我们就会为偏离的程度感到惊讶。

正是与个人的总体历史观有关，如今的学生才容易患一种职业病——这发生在历史研究可能影响实际生活行为的某一点上。随着各式各样的历史逐渐更为彻底地相互分离，那些关注大众群体或全社会的人，容易对历史进程产生过于片面的看法；而且，以我们思维方式的现状，这样的想法很容易遍布世界各地。这就易于形成一种过于宿命论的观点，因为它消除了人类的重要性以及人类意愿的作用。的确，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在历史进程的认识上过于僵硬，如果历史进程让大多数人多数时候感到无能为力，那么它也给那些使自己处于利用它位置的人以巨大的优势。一个有想象力的人，

总能轻松地几下子就让那些仅仅衡量目前趋势然后就指望这些趋势无限延续的大批人群困惑不解，大败而去。我们绝不能说自己只可能有两种未来——即随着其中一种或另一种的发生，世界就会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因为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而伟大的历史可能在一个小支点上转动，因此更好的做法是，搜寻重要的支点性细节，而不是试图研究所有的细节。假如 1789 年位居法国王位的是一个像亨利四世的人，而不是路易十六，那么将有多少历史不得不是空白的，又有多少事物的深层结构会被改变，想到这些就让人头晕目眩。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实际上一定是少数的几个人，由于坚信自己的事业，在 1917 年取得了在三十年内就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注释和参考

- [1] *Research and Modern History*,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at Cambridge, November 19th 1930 (London, 1930), p. 4: 'For history as a whole this popularisation is unlikely to be good, to research it may actually be fatal'.
- [2]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Professor I. Bernard Cohen and the late Professor Alexandre Koyré.
- [3] A. C. 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echnical invention,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63.)
- [4] Page Smith, *The Historian and History* (New York, 1964), pp. 143 - 145, 147, 158, and chapter 12.
- [5]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 Litt. dissertation: D. W. L. Earle, *Paul Rapin de Thoyras and the English Historiography of his Time, 1700—1730* (1961).

- [6] Joseph Bar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llemagne*, II volumes (Paris, 1789), the role of which is mentioned by J. C. Gatterer, *Historisches Journal*, I, 170.
- [7] H.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1955), pp. 52 – 55.
- [8] H. A. L. Fisher, *Paul Vinogradoff* (Oxford, 1927), pp. 20 – 21, 34.
- [9] *Ibid.* pp. 15-16, and H. A. L. Fisher,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Cambridge, 1910), pp. 24 – 25.
- [10] I dealt with this aspect of the matter in ‘Tendencies in Historical Study in England’,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IV (1945), 212 – 213.
- [11] E. Labrousse, ‘1848 – 1830 – 1789. Comment naissent les Révolutions’,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Paris, 1848), pp. 1-20, with summary of the succeeding discussion, 20 – 29.

This inaugural lecture was delivered in Cambridge on

10 November 1964.

出版说明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他从分析辉格史学出发，指出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

巴特菲尔德是生于1900年的著名史学家，他最出名的两部著作篇幅都不大，一是发表于1931年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另一是1949年出版的《近代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 - 1800*；中译本：《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在1931年发表的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这一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他在“前言”里就指出——

本书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

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

实质上，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而是涉及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他说：

事实上，所有历史都倾向于转为辉格党式的历史……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关键在于，结合现在研究过去；尽管当它的含义得到深思熟虑后可能不会引起反感，尽管可能有一种感觉认为它不可避免，但即便如此，这样做常常阻碍了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它把对历史的认识理解成直接地、永远地参照现在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现在的体系，历史人物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分为促使时代进步的人以及试图阻碍时代进步的人。这样，就产生了便捷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依照它可以任意挑选和淘汰，从而突出他的重点。依照这种体系，历史学家必定会把他的作用解释为，要求他对过去与现在的相似点而不是不同点非常警觉；这样，他会发现不废吹灰之力就可以说他已经从过去看到了现在……（见本书第一节和第二节）

巴特菲尔德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一书对后来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取向影响颇大。因此我们特约请

李晋女士译出此书，并附一篇巴特菲尔德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学研究的现状”，以便中文读书界参考。

三联书店编辑部